

分类号 _____
U D C _____

密级 _____
编号 10741

兰州财经大学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历史发展
及当代价值研究

研究生姓名: 杨学聪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张存刚

学科、专业名称: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提交日期: 2021年5月30日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杨学胜 签字日期： 2021.5.30

导师签名： 张存刚 签字日期： 2021.5.30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 （选择“同意”/“不同意”）以下事项：

1. 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 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 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杨学胜 签字日期： 2021.5.30

导师签名： 张存刚 签字日期： 2021.5.30

A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ist Thought on Social Governance

Candidate: Yang Xuecong

Supervisor: Zhang Cungang

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理论指导，这是我党总结历史发展规律后得到的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作为其中重要构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实践提供重要理论与方法指导。党的十九大对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了全面安排部署，强调要加强社会治理创新，满足民生需求，保障人民生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指导中国社会治理实践，对探索中国社会治理创新趋势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首先分别探讨了社会、治理、社会管理、社会自治等与社会治理相关的概念，认为社会治理、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治它们是既互联又有差异的。在第二部分，阐述了该思想的思想渊源和形成条件，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治理思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治理思想。就马克思、恩格斯而言，他们的经典著作中包含有丰富的治理思想，本文从社会治理的主体、内容、目标等方面进行了概括。列宁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运用于实践的第一人，他的社会治理思想主要表现为：坚持党的总体领导地位；坚持人民治理主体地位；动员人民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加强法制建设；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等。在第三部分，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治理思想的探索、发展、丰富、完善和升华。他们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强调法治与公平，顺应时代发展需要不断创新社会治理，他们在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第四部分，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发展的现实指导价值。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一以贯之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指导，为我国社会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把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对中国社会治理提出新观点、新理念，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与时俱进。新时代，在推动社会治理思想发展时，我们必须把理论创新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要充分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最后，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出发，列举中国社会治理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不足，结合我国十四五规划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的建议，探索了未来中国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趋势。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社会治理 当代价值 创新趋势

Abstract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ersists in taking Marxist theory as its theoretical guide, which is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gained by our Party after summarizing the law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Marxist social governance thought provide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methodical guidance for the practice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de comprehensive arrangements for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emphasizing the need to strengthen innov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 meet people's needs and ensure people's livelihood. This is a continuation of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rxist thought on social governance. According to China's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innovation trend of China's social governance by applying Marxist social governance thought to guide the practice of China's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this paper firstly discusses the concepts related to social governance, such as society, governance, social management and social autonomy. It is believed that social governance, social management and social autonomy are interconnected and different. In the second part, the ideological origin and formation conditions of the thought, as well as the Marxist classical writers' social governance thoughts, including Marx, Engels, Lenin's social governance thoughts. As far as Marx and Engels are concerned, their classic works contain abundant governance thoughts. This paper generalizes the subject,

content and goal of social governance. Lenin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apply Marx and Engels' theories into practice, and his social governance thought is mainly manifested as: Uphold the Party's overall leading position; Uphold the principal position of the people in governance; Mobilize the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governance; Strengthen legal construction; The pursuit of social equity and justice. In the third part, it analyzes the exploration, development, enrichment, perfection and sublima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s' thought of social governance. They have always adhered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hered to the principal position of the people, emphasized the rule of law and fairness, and constantly innovated social governan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Times. The social governance though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med by them in practice are th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social governance thoughts. In the fourth part, it discusses the realistic guiding value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social governance thought. Marxist thought of social governance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governance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practice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China. Combining Marxist social governance thought with the concrete reality of contemporary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t puts forward new viewpoints and new concepts for China's social governance, which fully shows that Marxist social governance thought keeps pace with The Times. In the new era, whe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governance thoughts, we must combin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base ourselves on the practical need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ory in guiding practice. Finally, starting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is paper lists the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of China's social governance, and explores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s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future by combining the suggestions of improving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and improving the level of social construction in China's 14th Five-Year Plan.

Keywords: Marxism; Social governance; Contemporary value; Innovation trend

目 录

1. 导 论	1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1
1.1.1 选题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1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
1.2.1 国内研究状况	2
1.2.2 国外研究状况	5
1.2.3. 简要评述	5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6
1.3.1 研究内容	6
1.3.2 研究方法	6
1.4 研究创新点及不足	7
1.4.1 创新之处	7
1.4.2 不足之处	8
1.5 概念界定	8
1.5.1 社会	8
1.5.2 治理	9
1.5.3 社会管理和社会自治	9
1.5.4 社会治理	10
2. 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创生和发展	11
2.1 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思想渊源	11
2.1.1 批判吸收西方古典思想	11

2.1.2 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思想	12
2.2 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形成条件	13
2.2.1 理论条件——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13
2.2.2 实践条件——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13
2.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治理思想	14
2.3.1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治理思想	14
2.3.2 列宁社会治理思想	18
2.3.3 经典作家社会治理思想的评价	20
3. 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治理思想的发展	22
3.1 毛泽东对社会治理思想的探索	22
3.1.1 毛泽东社会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22
3.1.2 毛泽东社会治理思想的评价	24
3.2 邓小平对社会治理思想的发展	24
3.2.1 邓小平社会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25
3.2.2 邓小平社会治理思想的评价	26
3.3 江泽民对社会治理思想的丰富	27
3.3.1 江泽民社会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27
3.3.2 江泽民社会治理思想的评价	29
3.4 胡锦涛对社会治理思想的完善	30
3.4.1 胡锦涛社会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30
3.4.2 胡锦涛社会治理思想的评价	32
3.5 习近平对社会治理思想的升华	32
3.5.1 习近平社会治理观的主要内容	33
3.5.2 习近平社会治理观的评价	35

4. 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发展的现实指导价值	37
4.1 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运用价值	37
4.1.1 思想价值——理论创新与时代特征相结合	37
4.1.2 实践价值——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需要	38
4.2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取得的成绩及面临的问题	39
4.2.1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取得的成绩	39
4.2.2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	42
4.3 今后我国社会治理发展的新趋势	44
4.3.1 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	45
4.3.2 进一步优化社会治理理念原则	45
4.3.3 运用更加科学的方式方法进行社会治理	46
4.3.4 社会治理的任务要更具时代性	46
结 语	49
参考文献	50
后 记	59

1 导 论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 选题背景

“社会治理”，作为新的执政理念，由社会管理升级而来，该理念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被正式提出。会上，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构成，是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社会治理是新一代领导集体在不断的总结以往社会管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形成的理念，是新的成果。将社会管理理念提升为社会治理理念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要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此时，伴随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领域的问题随之增加，人民满足诉求增长、社会结构不断转变，社会利益分配多元化，社会矛盾逐渐日益更新，各种社会问题亟待解决。在新时代，我们党可能需要在很长的阶段内面临一项重大的历史课题，就是不断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提升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就我国目前社会环境及形势看，必须要坚定党的全面领导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引领。在马克思的著作和相关论述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没有“社会治理”的准确定义，但实际上他的所有社会发展理论都基于“治理”问题，其社会治理思想丰富的蕴含其中。这些思想，成为当代中国迫切需要的理论指导，为新时代中国，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指明了出路。纵观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发展历史，它是一套科学的社会治理理论体系，并且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构建而形成的。为了提高我国社会治理水平，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回归原著，重温经典作家关于社会治理思想的初心，挖掘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完整而精准地把握其基本内涵，不断地吸收其社会治理思想智慧。

1.1.2 研究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着人们发现历史规律，探寻解放之道。自传入中国以来，其中的社会治理思想就成为了中国社会治理的行动指南。从经典作家的原著中探寻他们对社会治理的思考，把它们运用到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中，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有助于完善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理论意义

社会发展必须要有社会治理与之伴随，为寻找解决中国社会治理问题的理论方案，不断地推进社会治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完善与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为指导。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坚持它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思想指导是党和政府制定政策法规的理论依据、行动指南。于是，研究经典作家著作中的有关社会治理的论述，就是从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中汲取营养，有助于探究它在中国的继承与发展；有助于把握它的整体的社会治理思想的发展脉络；有助于认识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发展历程；有助于认清它在中国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这对提升创新中国社会治理体系有着重要意义。

而且，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蕴含着多领域、多学科的内容，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等领域的学科。对这一理论进行追根溯源的研究，有助于这些相关领域学科的发展。

（2）实践意义

当前，随着改革的继续深入，社会问题与矛盾相互交织，在这一背景下，完善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就显得格外重要。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社会治理，要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中完善和发展。面对新挑战，社会治理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要创新治理理论和治理方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历史发展，对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建设，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内研究状况

（1）关于社会治理概念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对社会治理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且对其思想内涵有了较深的认识和思考。20世纪末，国内开始广泛的对社会治理展开研究，俞可平教授（2000）把治理定义为“满足公众的需要，在一个既定的范围之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①丁元竹教授（2016）定义：“社会治理是基于共同的社会规范等社会活动，包含了社会关系

^①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5。

的协调，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化解以及消除社会冲突和社会风险的防范。”^①燕继荣教授（2017）认为社会治理体现为多元治理主体的共管共治。由此可知，社会治理更强调多元主体，是为了满足社会各成员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全面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促进资源合理分配，实现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多元治理手段。

（2）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研究

随着社会问题的不断突出，社会治理成为热门话题引发众多学者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社会治理思想，进行大量研究。从中国知网（CNKI）的高频引用和下载量数据来看，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的：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某一理论视域下研究社会治理思想。

马力昉（2014）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方面探讨社会治理，肯定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为实现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他从人民利益、民生改善、矛盾解决等方面分析得出，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必须要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李鹏（2014）从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方面探讨社会治理，强调坚持走法治化道路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有力保障。要在法治思维的指引下，规范社会秩序，在法律制度的作用下，化解社会矛盾，在法治氛围中，维护社会稳定。

蔡青竹（2016）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方面探讨社会治理，分析了国家、社会、个人、自然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治理就是要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社会与个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三个维度关系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理论与方法指导。

张璐（2019）从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方面分析，认为坚持公平正义原则实现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的根本，在社会治理思想观念的转变、资源分配、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要充分实现公平正义。

这些文章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出发，展开对社会治理思想的研究，体现了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要坚持人民为本、法治为根，充分彰显公平与正义。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治理思想的研究，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主要文献有：

孙涛（2015）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职能、党委领导以及社会治理方式等多个方面论述社会治理。认为经典作家的社会治理思想是深刻批判各类社会主义思潮、资本主义制度后，对未来社会形态进行大胆憧憬后形成的。

曹胜亮（2019）从来源、思想核心、价值目标等方面分析了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的

^① 丁元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思路》[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

内涵,指出:“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是对空想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巴黎公社分别的扬弃、认识、总结经验而形成的。其核心思想是协调社会各利益的关系,通过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目标来自主治理,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①

杨晶(2015)中指出,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治理的内涵是,既要坚持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又要坚持人民主体性,提升人民群众参与治理的能力与积极性;还要健全制度体系,维护社会公共秩序。

由上可知,以上学者从不同层面研究了经典作家的社会治理思想,及对这些思想对中国社会治理影响,学者们结合中国国情及社会发展的实践需要,探究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治理思想对我国社会治理的指导意义。

第三,对中国历届领导人的社会治理思想的梳理。如:

李戈(2019)研究毛泽东的社会治理思想,认为:“毛泽东在治理对象、目标和主体三个方面,着重处理了大社会与小社会、社会结构与社会价值、党与群众三重核心辩证关系。”^②

孙卫英、陈跃(2015)研究邓小平的治理思想,认为,“确立法治思想,是邓小平社会治理思想的前提和基础;以政治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是邓小平社会治理思想的关键;形成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体制,是邓小平社会治理思想的核心;探索‘共同富裕’的社会公平之路,是邓小平社会治理思想的价值诉求。”^③

代山庆(2012)指出,江泽民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提出了“三位一体”的社会建设和管理思想。同时,他还认为,江泽民的社会治理主要在于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既要加强社会的治安工作,又要将德治融入社会的治理活动中,形成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

蔡清伟(2012)指出,胡锦涛结合中国国情,在社会管理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将社会管理提升到新高度,并提出了一系列社会管理新原则、新任务,为创新中国社会管理作出新的贡献。

丁元竹(2018)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括: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加强国家安全法治保障,提高防范和抵御安全风险能力;加强网络空间建设,培育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加强城市常态化管理,狠抓城市管理顽症治理;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

^① 曹胜亮,胡江华:《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及其当代意义》[J].江西社会科学,2019,39(06):25-34。

^② 李戈:《毛泽东社会治理探索的三重辩证法》[J].求索,2019(02):48-56。

^③ 孔卫英,陈跃:《邓小平社会治理思想探析》[J].邓小平研究,2015(02):96-103。

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①

以上作者，是对中国历届领导人的社会治理思想进行研究。他们把社会治理的研究置于中国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归纳总结领导人们的社会治理思想。

1.2.2 国外研究状况

根据现有的文献分析，西方学者从未停止对“社会治理”的研究脚步，自20世纪末，西方国家为了应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启动了政府改革运动，一些新的理论，如合作治理，公民社会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治理与善治理论等逐渐被提出与发展，学术界对于社会治理的研究颇有成绩。但仅有少数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

20世纪末，西方国家在应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启动了政府改革运动，形成了一些社会治理思想。库依曼主编的《现代治理》(Modern Governance)一书，是治理理论的早期代表。书中用多元性、复杂性、动态性三个系统性特征描述了治理的基本属性。詹姆斯·N·罗西瑙指出：“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有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②在诸多流派中，他们的基本政治主张多倾向于自我治理，公民社会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治理与善治理论等都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

西方学者对社会治理的研究颇多，但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为直接研究对象的著作相对较少，大多出现在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的一些著作中。政治学方面，安东尼奥·葛兰西认为，国家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结合体，市民社会是决定国家的重要因素。社会学方面，诺曼·莱文曾在中国政法大学做过一次演讲，分析了马克思国家和市民社会理论，认为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篇经典文献中充满了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设想：市民社会的组织将会成为治理的中心，市民社会也将会取代国家成为治理的中心。管理学方面，亨利希·库诺在《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一书中系统阐释了国家管理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

1.2.3. 简要评述

综上，不管是对概念进行研究，还是把社会治理置于马克思主义某理论领域中进行研究，我国学者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把“社会治理”作为热点话题进行研究。从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主要是从著作、专著和领导人讲话稿中分析这一话题，总结的

^① 丁元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03):13-18+152。

^② [美]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5。

理论性较强，与实践也有较好的结合，但欠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及其中国化的进一步研究。也就是说，理论创新要与时代特征结合。在新时代，结合时代需求，探寻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现实价值将是一个无限的探索过程。

从国外文献分析，与国内不同，国外学者由于自身研究理论视野和角度的不同，形成了诸多对社会治理思想的研究流派。总体来看，一方面，西方的社会治理思想主要是在研究流派中产生，符合西方国家的治理习惯与治理思维。我国要积极总结他们的成功治理经验，合理的借鉴西方社会治理模式和策略，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研究，他们更多的研究方式是从研究其他问题的过程中提及这一问题，并没有把它作为独立研究对象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可以看出，对于这一思想在西方的研究，还是很薄弱的。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论文在写作过程中，重点参阅马恩列原著中与社会治理相关的内容，以及中国各个时期，对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现状获取实践信息，列举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对我国社会治理创新趋势进行了重点研究。主要有以下内容：

(1) 界定社会治理的相关概念，通过对社会治理、社会管理及社会自治的概念界定，明确它们之间的异同及互联关系。

(2) 通过对经典文本及文献资料的学习，从文本的间接表述中概括经典作家对社会治理的认识，总结社会治理的主体、任务、目标；从列宁总结的俄国治理经验中，概括列宁的对社会主义社会如何治理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治理的构想以及列宁对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总结，共同构成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

(3) 中国在社会发展历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通过研读历届中国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专著，概括他们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他们立足时代发展需求，创新社会治理，丰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内涵。

(4)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成绩卓越，但依旧面临着新的困境与挑战，要用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指导今后我国的社会治理，文章最后探究了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趋势。

1.3.2 研究方法

(1) 文献分析法。理论的研究要以经典著作为本。所以，本文大量参阅经典作家

的经典著作以及国内外关于社会治理的文献，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知识，对文献选取、编辑、整理、处理并分析。所选取的文献也是国内最新出版的著作，选择最适合本文资料研究的处理方式来分析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弥补前人的不足，同时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发展脉络。

(2) 理论联系实际法。学术论文的研究过程必须要把理论与实际结合。就本文而言，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一般原理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实践中去。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依据，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探索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实践经验。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可以杜绝脱离实际、就理论谈理论，大而化之，泛泛而谈等问题。

(3) 比较分析法。本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梳理经典作家的社会治理思想，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他们对社会治理的理解，探讨异同。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历史发展为主线探寻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治理思想的探索、发展与完善，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不同时期的发展需要，比较分析他们对社会治理理念的创新发展。

(4)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地被传承和创新，理论逻辑和历史进程具有同一性，理论的创新发展与时代特征具有统一性，表现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特性。本文在探究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创立、发展以及在中国的运用时，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防止脱离历史，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梳理各个时期的理论成果，力争做到结论有根据。

1.4 研究创新点及不足

1.4.1 创新之处

视角独特。本文把社会治理的研究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总结、分析经典作家及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治理的构想以及不同时期的社会治理实践经验，比较分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传承和创新。将这一思想的历史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来把握，既体现了宏观整体性，又能从全局视角把握它对中国社会治理的指导作用，对实现我国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愿景有重大意义。

内容新颖。本研究的内容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经典作家及中国领导人的社会治理思想进行系统归纳与总结，同时从当代社会治理实践中总结成绩，发现问题，探索了今后中国社会治理的创新趋势。

1.4.2 不足之处

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认知水平把握有限。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并没有明显的“社会治理”字眼，但行文之间到处充满经典作家对构建未来社会的设想，充满了社会治理的思想。对于社会治理思想的论述需回归文本进行分析研究，但因本人对理论研究的能力有限，不能很好的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造成一些表述可能不够严谨。

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涉及多学科的内容，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对某个人的思想或者是对某个人主政时期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相关报告、讲话等做研究。同时把社会治理置于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中，由于学识短浅，对“社会治理思想”这一理论主题进行系统分析的能力有限，所以在应用和把握上可能存在不能深刻理解的问题。

1.5 概念界定

作为一个初学者，从概念入手进行论题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就社会治理而言，本文有必要对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等概念进行界定，并对社会管理、社会自治及社会治理的关系进行说明。

1.5.1 社会

在中国“社会”一词的含义古今差异较大。春秋时期，“社会”主要指人们聚集在一起的一个特定场所，这个场所人们主要为了祭祀神灵。其中“社”是地方，“会”是汇集。后来慢慢开始用于其他节日的集会，再发展演化为泛指由志趣相同者结合而成的组织或团体。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的概念逐渐丰富，现在人们把社会理解为人们生活的共同体。把“社会”作为一个范畴来研究，必须要把它放入特定时代背景下。所以，社会具有历史性，是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的人类共同体。基于此，明确区分“社会”广义与狭义的含义，对通篇文章的定位十分必要。广义的“社会”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了社会层面的各个领域，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狭义的“社会”特指社会领域中的社会事务，把教育、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社会保障等统称为社会事务。

社会一词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运用广泛，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概念。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

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①。可以看出，社会是人们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建立的相互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一定关系，把各种关系相互联系在一起就是社会。马克思视野中的“社会”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他把广义的“社会”归纳为五大社会形态，体现在他的社会形态理论中；把狭义的“社会”规定为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社会。本文的“社会治理”所指的“社会”是狭义的“社会”。

1.5.2 治理

“治理 governance”一词源于西方，解释为被管理的状态，是一种统治的行为，与管理、统治含义相近。实际上，上世纪人们对“治理 governance”这个词的使用率很低，在很多国家的语言中，根本没有“治理 governance”这个概念。但在上世纪末，世界各国危机重重，经济、文化、政治受到严重冲击。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在这些冲击还未掀起巨大的波澜时，就开始着手应对冲击，进行治理研究，自此“治理 governance”一词逐渐变为热词，治理、管理和统治三个概念也逐渐分离开了。最早的治理理论出现在《没有政府的治理》一书中，其中把“治理”解释为一种主体间发生的一系列活动的规则，书中认为，国家的强制力量对治理的实现可能不在是必要因素。后来，针对全球治理现状，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 governance”做了概述，认为治理是一个协调社会利益冲突的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持续协调各种公共部门和私人机构的利益关系。

1.5.3 社会管理和社会自治

社会管理是指运用一些方式和手段来协调、管理人们的公共生活，除了对人们的生活，对社会组织和公共事务也进行管理、规范与服务。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是核心，主导各项管理行为，协调人们的社会公共生活。以实现社会公平为目的，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解决，对社会风险进行预判规避，对社会行为进行规范制约，对社会矛盾进行疏导化解。可以看出，社会管理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行为，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有的管理行为，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十八大之前，我国一直运用社会管理模式进行社会建设发展，统治、管制的意味浓重，更多采取命令方式和行政手段，充分体现了社会管理的单一性特征。

与社会管理相反，社会自治更多强调政府以下的自我管理，以社会组织为基本组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0页。

形式，社会成员主动参与社会管理。其特点是人与人在自由平等关系上的自我管理模式。以社会组织为主导力量的社会自治行为，强调社会组织不是独立个体，内部有党组织，是在党组织的约束和国家法律的保护下有序进行自治行为的。

1.5.4 社会治理

社会不断进步，社会管理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创新发展成为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包含了社会管理行为，也包含了社会自治行为，形成了一方主导多方参与的治理行为。是社会管理和社会自治的行为共同体。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已经形成为由党、政府、人民、社会多元参与国家事务，处理社会问题的过程，体现为多元治理主体的角色互动，实现了管理与自治的融合。目前，我国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不断向前推进，社会治理也要与时俱进。本文将把“社会治理”放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去研究，通过研究政府与社会的共治，即“善治”的实现，探究社会治理的创新趋势。

综上，通过对社会治理相关概念的界定，社会治理中包含了社会管理和社会自治的内容，在我国实现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可以更大程度的发挥人民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他们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也能体现社会凝聚力，有利于化解矛盾，激发正能量，实现国家安全稳定、社会一片祥和、人民安居乐业。

2 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创生和发展

所有的思想在其创生之前都依靠深厚的理论基础，它们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形成条件，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也不例外。一方面来自于经典作家们对前期学者思想的思考。另一方面它来源于西方国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索。自国家产生后，社会治理应运而生，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对应有不同的社会治理形态。那么，这些治理形态是否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相适应，是否具有合理性，学者们对此进行了不断的思考。最终，经典作家们通过预判未来社会，总结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实践经验，二者结合形成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

2.1 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思想渊源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主要来自于对西方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三大思潮的批判与继承，其中的社会治理思想也与它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西方国家也从未停止运用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对社会治理进行研究，三大思潮和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来源。

2.1.1 批判吸收西方古典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治理思想批判的吸收了三大思潮中的契约思想、财政治理思想以及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的思想。

一方面，以卢梭、康德、黑格尔为代表，他们的社会契约思想影响着马克思对国家、人、自由、平等的认识。卢梭认为，人生而自由，人们想要享有权利，必须要建立在约定之上。他反对君主制，主张人民平等的参与政治，实行民主制，希望订立一种能够充分显示人民共同意志的社会契约，实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康德是在道德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契约思想，属于自由主义，他希望通过理想政治制度的构建，使人民得到自由与权利。黑格尔的国家起源说，否认契约缔结，认为国家是至上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永远是前者决定后者。但马克思否定了黑格尔的这一观点。以上三位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契约思想，对马克思的社会治理思想或多或少有影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在哲学方面的思想来源。

另一方面，亚当·斯密对财政的治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他认为国家的主要职能就是保护社会和每一个人，不应该过分干预经济

或其他领域的事务。这样，国家的职能就大大缩小了。同时，他还把国家财政支出划分为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并且极力反对非生产性财政支出。他坚持建立“廉价政府”，缩减国家财政支出。可以看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财政治理思想，也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提供了思想来源。

最后，空想社会主义中的社会治理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也有影响。欧文针对他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对未来社会进行一系列构想，认为未来社会公社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他对公社中的人员数量、分配方式原则、职业规划都做了大胆设想，生产资料公有制会将所有社会产品有计划地分配给每一个人，要求他们参与社会集体生产，经济危机、生产过剩等现象不会出现，机器只发挥其本质作用，提高生产力丰富社会产品。公社内部按照年龄和本性，依照人人平等的原则进行分配，全员参与社会事务，无失业者。同时，他还重视教育，主张消灭分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以上西方古典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中的国家职能界定、廉价政府、教育需求、就业需求、人的全面发展等观点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2.1.2 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思想

西方国家倡导自由，在社会治理方面希望在自由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秩序的井然有序。任何时候“自由”始终是他们重要的政治文化取向。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治理思想在西方国家也逐渐成熟了。

在探寻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他们通过分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梳理了社会治理的一些模式。第一，前工业化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最为原始的形态。此时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由“一元”过渡到“二元”，即从合并到分离。在这一阶段，形成了绝对国家的治理模式，它导致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逐渐分离，社会不仅处于边缘位置还要无条件服从国家，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更多强调国家对公民的保护，治理范畴从个人道德规范转向国家依法治理。第二，主权和人权的纷争，是工业化时期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主要表现。在这一时期，他们的组织是不同形式，国家和社会职能是分离的，这得到了在当时思想家们的普遍认同。所以，就自然而然的在社会契约论的构架下，形成了天赋人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虽然国家一直保持着制约社会的状态，但是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反抗，形成自治。第三，19世纪中叶，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思想家在唯物史观中分析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他们认为国家和社会既对立又统一，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不是从来就有的，社会决定国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应该在相互

竞争中得到发展，最终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秩序发展，体现自治的秩序发展。

2.2 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形成条件

上世纪，经典作家们潜心理论研究，总结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经验，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基础上，大胆构想未来社会。他们批判德国古典哲学先行者关于“国家决定社会”的历史观，在对所处社会形态的国家——社会关系进行重新思考时，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相关问题，形成了丰富的社会治理思想。

2.2.1 理论条件——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国家——社会”关系开启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宝藏之盒，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起点。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决定论，认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的产生和发展与阶级社会息息相关，是阶级社会发展的产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阶级会消失，国家也随之消亡。社会则不同，它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共同体，国家是从社会这个共同体中衍生出来的元素，是政治共同体，同其他社会组织相互平等，不能凌驾于其他社会组织之上。所以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国家源于社会，高于社会，又回归于社会；社会是本，国家是末。当人类社会演变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时，将呈现出人能够自由全面发展的状态，在那时，国家已在历史长河中消亡。这个大胆的预言指导人类把政治发展方向从国家统治逐渐转向社会治理。在治理过程中，国家依然起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在同其他社会组织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进行了充分的融合，既体现了国家政治的重要性，也体现了社会治理的必然性。

2.2.2 实践条件——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进入 17 世纪，在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他们逐渐在政治领域崭露头角，但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成为资产阶级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为扫清障碍，资产阶级与封建制度的维护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相继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革命，由于资产阶级代表了当时先进生产力，封建制度很快被动摇，逐渐被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新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制度代替。至此，资产阶级水到渠成的成为这一关系的主人，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此建立。在这一制度下，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机械化的大生产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生产方式，社会生产效率得到了比在封建制度下

还迅速的发展，他们很快完成了产业革命。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形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变化，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导致生产资料很快被这些富人占有，社会化的生产以及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使有产者与无产者，越来越对立，并趋于分化，社会地位差距也明显增大，形成了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大量财富的诱惑下，资产阶级扩大了社会生产，致使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产生。表现为商品生产、销售过程严重脱节，社会生活混乱不堪，破产、失业。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不断升级，无产阶级在不断的社会冲突中很快得到成长，组织革命反抗的脚步也加快了。

马克思从他的生活体验中感悟到，是经济危机导致了工人阶级生活艰辛，那么，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反抗斗争要开始了。他预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①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治理乱象，他认为，无产阶级想要从这一灾难中重生，彻底改变经济状况，必须通过革命手段奋起反抗。应该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这样可以有效解决社会矛盾，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这些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形成。与此同时，自然科学的发展给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提供了唯物观，促使人们也开始辩证地看待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2.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治理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总结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时，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面纱，憧憬未来社会发展方向。他们经典著作的字里行间，都蕴含着对未来社会丰富的构想，包括对社会治理的设想。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最为突出。

2.3.1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治理思想

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社会事务是全员之事，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共同治理。虽然他们没有直接给“社会治理”下具体定义，但是在他们的书信、著作、评论、报刊文章中都充满了对未来社会治理问题的思考，主要体现在《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中。在这些著作的言辞中可以看到，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的生活生产需要，马克思认为国家要发挥治理社会的职能，要从发展生产力、发展文化教育、建立社会保障等方面不断进行努力；市民社会中的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要为了实现同一目标形成社会团体，积极参与到社会事务中去；同时，广大人民也要主动出击，为了自己生活更好，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恩格斯在马克思对社会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社会实践和理论研究，洞察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并提出思想指导，丰富着马克思的治理社会的思想内涵。

（1）社会治理主体广泛

马克思认为，国家、市民社会和人民或将是治理社会的主体。

第一是国家。把社会分为五种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实践中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划总结提出的。原始社会，人们都是从自然界中获取生活资料，产品单一，物质生产简单，这是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表现，社会处于自发松散的自我管理状态。随着生产力水平逐渐的提高，到一定阶段就产生了阶级，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国家作为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暴力工具在阶级斗争中迅速形成，占主导地位，代表整个社会，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但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成为阶级的代表，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专门为统治阶级服务。而且，国家有工具性，在阶级斗争和矛盾中起调节作用，维护社会稳定。所以，马克思认为国家职能应该由统治职能和社会职能两部分组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国家机器被打破，统治职能逐渐弱化，但社会职能中治理公共事务的职能被保留了下来并逐渐变强。其中包括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共同利益，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等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国家随着阶级的消失，其阶级统治性不断削弱，最终全部职能都会消亡。到那时，国家权利将完全与社会融合，其职能完全复归社会。

第二是市民社会。马克思在预判未来时，深入研究了市民社会。他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关系，伴随着生产力不断的发展，商品的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的循环将会频繁出现，市场经济关系高度发达的时候，市民社会就此形成，他并不认为市民社会如同黑格尔所说的那样由国家决定的，而应该是“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①。这个社会组织包括了民间组织、家庭、个人等机构。他从经济角度分析了市民社会，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治理形式，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的形成与建立，以往政治组织凌驾于社会之上，要逐渐转变为服务于社会的社会组织，即国家的政治职能要彻底转变，治理主体应当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1页。

国家发展到国家与社会，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权衡中，国家要放权于社会，转变职能，这样可以让市民社会逐渐发展成为民主自治的社会组织。

第三是人民。巴黎公社经验让马克思更深刻的理解人民的意义。“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①也就是说，公社治理要代表人民利益，人民也要参与公社治理，这里的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中等阶级。首先，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必须要铲除旧的国家政权，建立新政权，要对公社进行治理。工人阶级代表们作为公社委员投身公社治理中，成为公社治理的主体，在治理实践中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其次，农民是法兰西战争的最终受害者，他们要承担巨额战争赔款，但是公社以对农民最有利的方式解决农民面临的问题，维护农民的利益。农民也就紧紧围绕在公社周围，主动参与公社治理，选出为自己负责的公社勤务员。最后，富有的资本家对店主、手工业者和商人进行杀戮、剥削和压制，让这些中产阶级不得不承认公社的伟大，认为公社有能力从思想上、身体上把他们从僧侣的被迫中解放出来，最终他们也同工人阶级、农民一样，团结在公社周围，成为公社人民的一部分，参与公社的治理。简言之，公社治理中，人民实现自己当家作主，包括行使人民主权、人民普选、人民监督等行为。人民将成为公社治理的主体力量。

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预判是自由人联合体成为社会治理主体，从而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在那时，不仅国家政权开始向社会自治转变，人民也实现最大限度的自治，每一位社会成员都将成为社会的主人，自由发展的个人组成联合体登上舞台，共同执行社会治理职能。

（2）社会治理内容多样

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是社会治理的根本任务。马克思在探索人类解放之道时发现，人们“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②。这是人类解放的前提。人们为了基本生活不断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一定程度后，当物质生产积累到一定阶段，人们生活基本上能得到保证后，一些更高层次的需求相继出现。社会治理同样也要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提升为更高层次的治理。为了实现高层次治理，要从多方面入手，满足民生需要。

第一满足教育需要。马克思认为，未来和谐社会的建设者不仅重视物质财富，也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

更加重视精神财富，他们摈弃旧观念，代之以新观念。那么教育就格外重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须发展教育事业才能够实现。他所谓的教育是面向无产阶级及其子女的教育，尤其是儿童。他重视儿童教育，要求工厂不得使用童工，儿童应当走出家庭去接受社会的普及的教育。他的教育主张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工人阶级努力的去争夺教育权利。同时，马克思把教育融入到社会生产和人类解放中，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①。马克思对教育事业的意见建议，满足了工人阶级及其后代对教育的需求，也为未来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二满足劳动就业需要。劳动就业就是劳动者参与某种社会活动并从中获得一定报酬来满足生活需要。也就是说，为了生存人们必须进行劳动，人人都有劳动就业的需要，它是人们最本质和首要的需要。马克思认为，劳动者应当享有普遍就业的权利，要调动劳动者参与就业的积极性。在劳动力分配方面，他要求要合理分配劳动力，一方面避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造成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浪费；另一方面可以在生产全程中让劳动者成为主人。

第三满足社会保障需要。社会保障是当物质资料生产遇到风险或不确定因素，影响到人们正常生存时，社会给予人们保证基本生活的物质帮助。马克思认为，当遇到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时，国家有必要使用后备基金对弱势群体进行救济，建立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保障制度。而且，社会应当对年老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的人们提供保障措施，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由此可见，社会保障对于每个人都是必需的。

（3）社会治理目标多重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治理的目标具有多重性，至少包括三个方面：首要目标、核心目标和终极目标。

第一，社会治理的第一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马克思提出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②的公平分配原则，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典型模式，但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渗透，辐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上，社会还达不到公平正义。马克思深刻思考如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他从现实的人出发，在教育、社会保障以及税收等方面提出很多措施，让现实的人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确保社会环境尽量的人性化和公正化。马克思设想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实现公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促进产品极大丰富，让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有社会发展创造出来的福利。这样才能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5页。

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第二，社会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实现社会自治。社会自治对社会治理有重要作用。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时，认为公社是“生产者的自治政府”^①。在公社，人民可以实现真正的自我管理，较之旧的集权化的行政权力，公社可以使人民拥有平等的参与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权利，公社为人民提供平台普选出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利益的勤务员来处理国家事务，可以让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马克思高度评价公社的作用，认为巴黎公社在很短的时间消除大地主、暴发户、封建贵族，降低死亡盗窃等事件的发生，保证国家的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社的自治，包括普选权的建立；宗教的废除；教育的普及；人民武装的建立等等。这种由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国家治理和自我治理，是公社达到社会自我治理的理想状态。

第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最终的治理目标。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治理思想包含解放人类的伟大理想。恩格斯说：“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②未来社会，人是自由的，能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是被真正解放的。他们从现实的人出发来理解人的解放，尊重人的主体性，彰显以人为本的价值主旨。这里提到的“现实的人”，指生活在社会中的有生命的人，他们彼此结成一定社会关系，不断从事着实践生活。这些现实的人形成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个平台上，现实的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参与到社会事物治理中，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自由的，能够充分发扬个性，全面发展。

2.3.2 列宁社会治理思想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治理思想是对未来社会社会治理的理论构想，那么列宁就是把那些理论思考与实践相结合的第一人。他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治理思想同俄国实际国情相结合，提出具体治理思路，继承并发展了他们的治理思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党的总体领导地位

列宁分析党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作用，在社会建设实践中，他强调党政必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3页。

分离，要各尽其职。他认为：“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①党的领导机关不应该做管理机关的事务，党政不分会导致严重的官僚主义。他强调党应该保持“总领导，不干预”的原则处理社会事务。坚持党的领导，应该做好以下几点：确立党对国家政治和思想总的领导；由政府负责，选派内行制定社会治理方案；积极吸收优秀工农分子进入管理机关，通过培训、效仿学习，成为治理国家的内行；建立科学高效的政策法规和治理制度；加强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强力有效执行社会治理方针政策。总之，当布尔什维克党夺取了政权之后，俄国的发展从战争走向了治理，其中的所有成就都离不开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以及苏维埃政权的管理，它们是治理俄国的根本政治保障。

（2）坚持人民治理主体地位

列宁认为，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国家和社会的治理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他一方面广泛吸引劳动者尤其是贫民参与国家的日常事务，另一方面不断促进人民群众自治能力的提升。他不断激发人民群众的自治热情，让他们深切感受到自己的主体性地位。此外，列宁还强调，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要代表人民利益，保护人民主权，调动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民主不只是表面上的民主，即拥有权利和自由，更重要的是实现人民群众通过国家机关参与到真正的社会治理中来。人民群众要有选择权、撤换权、监督权；人民群众有权参与国家审判工作，这些举措都充分表明，列宁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

（3）动员人民团体参与社会治理

苏维埃人民通过国家机关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在实践中，他们有机的组合成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就是党与群众联系的媒介或者可以说是复杂系统中的“传动装置”^②。工会、共青团就是众多小团体的代表。工会作为最大的群众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上传下效的作用。从上，它不仅正确传达政党的先进思想，教育并动员群众参与国家建设与社会治理；从下，它还积极吸收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夙愿请求，直接向党政机关传达。列宁强调工会要“加强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③，充分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是以青少年为主的人民团体。列宁认为，对青少年积极培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断参与社会治理实践，磨练他们的意志，可以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治理人才。此外还有合作社、非党工农代表等团体，它们的任务就是联系群众、了解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0页。

^③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8页。

群众，发挥向上反映、向下传达的作用。总之，人民团体参与社会治理不仅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同时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纽带作用。

（4）加强法制建设

列宁认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实现高效社会治理，必须要建立健全法制体系，规范社会权力运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不断加强民主立法，加强法律和制度在社会治理中的规范作用。列宁要求成立国家监察机关，建立监督机制，党内实行层层监督管理。要求优秀的工人和农民通过人民政府参与到监督的行列中，行使社会治理职能，用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维护自己的利益。列宁加强民主立法，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与草案，充分体现他希望人民群众通过监督政府，间接参与社会治理。列宁告诫全党全国人民，法律是至高无上的，全国上下都要遵法守法，党员尤其要起带头作用。唯有这样，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才能实现“逐步过渡到由全体劳动居民人人来履行立法和管理国家的职能”^①。

（5）追求社会公正平等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生产力水平低下是苏维埃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他说：“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②主要是因为人们对财富拥有的比例不同，资产阶级远大于无产阶级，所以，为了实现财富占有比例均等，必须消灭阶级，可以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说“如果不把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级，平等就是一句空话。”^③在阶级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阶级不平等将长期存在。列宁认为，社会治理将会成为促进社会公正平等的核心，他积极采取措施，动员全体人民群众参与国家事务，实现人们的社会地位平等；组织开展扫盲活动，加强义务教育普及，实现全民族教育公平；他开展“计算与监督”活动，组织社会成员参与国家经济管理活动，实现民主政治平等。

2.3.3 经典作家社会治理思想的评价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治理思想共同构成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于社会发展实际，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治理乱象，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会加速国家内部矛盾的激化，大大阻碍生产力，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主义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8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5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16页。

制度会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在总结巴黎公社的治理经验时，他们批判的吸收资本主义民主，预判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治理特征，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重要论断——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这一表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理论基础。在他们的所有著作中虽然没有完整的对社会治理这一概念的定义，但其中涉及的最一般的人类社会发展原则问题，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指导。

列宁带领俄国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实践中，他以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治理思想为指导，创造性的提出如何对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治理的思想，在其重要讲话和著作中都可以看到他的治理俄国的新思想。列宁不断进行社会治理思想理论和实践的新探索，在科学的思想指导下，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治理的新局面。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治理思想的内涵。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任何一个思想都是从理论到实践，再由实践到理论这样辩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也是如此。列宁在论述社会主义时，辩证分析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认为理论在实践的检验过程中不断拥有活力，理论需要实践来修正。所以，当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后，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成为中国革命胜利、人民政权建立，社会建设中的各项社会事业推进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指导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不断向前发展。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已经超过对基本物质的满足，开始更多的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社会民主法治、社会安全稳定，以便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治理思想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中国后，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指导实践，顺利推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完成了中国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开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历史重大决策，推进着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的步伐一步步向前。在这条漫长的建设道路上，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发展的社会治理思想。

3.1 毛泽东对社会治理思想的探索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带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努力探寻新政权下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问题。“怎么建设中国？”“怎么治理中国？”这两个问题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的重点任务。在实践中，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思想，有效的解决当时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复杂问题，成为建设国家、治理社会的强大的理论武器。

3.1.1 毛泽东社会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结合中国基本国情、党情、民情，提出一系列社会治理思想，主要内容包括：

（1）坚持党的领导

毛泽东强调党对一切社会事业的领导作用，认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①要围绕中国共产党这一核心，开展国家建设，各项社会事业才会不断顺利完成。他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制度，让党领导一切工作，尤其是社会治理。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很多方针政策，丰富了中国的社会治理思想，为社会治理顺利进行提供政治保证。

（2）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毛泽东把人民群众置于社会治理的中心位置，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人民的力量注入到社会治理中，就是广泛吸收人民参与国家事务，最大限度的实现人民民主。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把社会治理提升为社会最重要的问题。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成为社会治理工作的根本遵循。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实际上,社会治理工作就是做群众工作,同群众站在一起,以人民群众利益的益为出发点,想群众所想,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现实生活问题。所以说,走群众路线,让群众直接参与社会事务,管理国家,是毛泽东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结合的独创性之一。

(3)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把社会发展归咎于社会矛盾,认为矛盾会促进发展。他把矛盾分为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认为后者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社会治理就是要解决社会矛盾,解决贫富差距、解决地位不平等、解决就业等等这些关系人们利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导致人民内部矛盾的引子。毛泽东认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需要用更加民主的批评教育的方式,要有团结有批评,还要再团结。不要把小矛盾激化为大矛盾,把局部的矛盾衍化为全局的矛盾,处理好这些小矛盾、局部的矛盾,社会就能相对稳定,也会平稳发展。毛泽东主张用专门的办法解决不同类型的矛盾,比如在科教文化领域,学术上要百家争鸣,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在党派关系上,各党派要保持共存与监督结合,长期相互联系,在各民族关系领域,56个民族相互平等,要团结互助。毛泽东探索出的矛盾学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为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指导

(4) 满足民生需要

毛泽东在社会治理中重点关注思想教育、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基本民生需求。认为思想教育是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就业是社会治理的关键方面、社会保障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所以,在思想教育方面,他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广泛宣传革命乐观主义价值观,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为人民服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等崇高精神。这些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成为当时社会治理的行为标准。在社会保障方面,毛泽东主张加强制度建设,实施有针对性的保障举措,在他的领导下,相继颁布了多条影响人们生、老、病、死的制度条例,让人们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福利。在劳动就业方面,建国初,连年战乱导致国民经济受损严重,工厂关门、就业形势严峻,毛泽东提出一系列措施解决就业问题: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扩大生产,增加就业机会;实行企业内招制度;等等。总之,毛泽东努力寻找解决民生问题的突破口,最大限度的实现人民利益最大化,发挥人民治理社会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5) 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稳定要从基层稳定做起,维护基层稳定是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基层组织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堡垒。所以在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在社会治理方面大胆实践,把人民群众进一步组织起来,形成如农民互助合作组织、生产合作社、群众团

体、工会组织等基层组织，动员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毛泽东认为社会团体在很多事情上可以直接想办法解决问题，他们是能够想出来很多好办法的。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很重视基层组织的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的。

3.1.2 毛泽东社会治理思想的评价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努力奋斗，实现国家性质的转变，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伟大局面。新政权建立后，如何建设、发展、治理新中国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重大问题。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治理思想、借鉴苏联社会治理模式不可能解决中国问题。中国有自己的国情：生产力不发达、农村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组织自身发展不成熟等等，立足于这一国情，毛泽东大胆实践，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的社会治理道路。

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探索中，毛泽东坚定人民群众可以创造历史这一主体思想，并把人民群众组织在一起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一过程中，新中国向好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日益增多。毛泽东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分析产生社会矛盾的原因，寻找化解社会矛盾的方法。他创造性的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命题，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治理工作提供重要理论指导。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对当代社会有效治理有重要指导作用。

毛泽东在社会治理实践探索中发现，让社会治理接地气、接人气，必须从基层做起，着力点、施力点和落脚点都要放在基层。他高度肯定“枫桥经验”在社会治理中的突出作用，强调要把这种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推广出去。可以说“枫桥经验”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治理的成功范例，给今后群众工作和社会治理工作提供重要启示。

总之，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治理实践探索中，形成的丰富思想，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的思想来源。

3.2 邓小平对社会治理思想的发展

邓小平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坚持以经济建设推动社会现代化建设，开创用经济发展带动社会进步的局面。在实践中，他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社会治理，并提出一系列社会治理观点，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理思

想，这一系列的治理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社会治理的思想内涵的继承与发展。

3.2.1 邓小平社会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深刻总结毛泽东的社会治理思想、分析改革开放前后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形成了更加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社会治理思想。其中包括：

（1）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治理，邓小平继续坚持党的领导，认为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成功与否。他坚持要改善党的领导，尤其是在社会治理中。一方面，他重视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努力为社会治理培养更多有能力的、年轻的、专业的社会治理人才。另一方面，他高度重视党政分离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历史遗留的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严重阻碍社会治理工作的推进，所以他提出精兵简政、权力下放、人事改革等措施，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工作效率。这样既能充分发挥党的统揽与协调作用，又能充分发挥政府的社会治理职能，使政府不断调动国家、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完成社会治理工作。

（2）加强民主法制建设

邓小平有“文革”时期的惨痛经历，在社会治理实践中，他吸取历史教训，反复强调要坚持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认为民主与法制是社会治理的驱动轮。他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通过发展民主，维护人民群众主人翁的地位，让人们群众真正的拥有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民主的实现，法制保障是重中之重。由于制度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等特点，民主必须依靠法制来保证其实现。邓小平强调广泛的民主与健全的法制的统一性，两个方面要同时加强，要同时抓，一方削弱都不行。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十五大将“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提法转变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彻底摒弃传统“人治”的治理理念，邓小平多次强调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认为民主与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根本遵循，是社会治理的根本方法。

（3）加强民生建设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社会治理的根本策略，生产力发展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转变以往观念，对社会发展做出正确判断。认为社会发展要先发展经济。阶级斗争无法解决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求，也无法解决社会生产的落后状态，社会问题的解决要靠经济发展来实现，社会治理要靠经济发展来满足人民物质需求。

所以，他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小康”的内涵是经济指标与人民生活指标的统一体现，“建设小康社会”包含丰富的民生思想和社会治理思想，目的是首先保证温饱，再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最终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摆脱贫困。建设小康社会，足以看出邓小平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视，他从人民的吃穿、住房、就业、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提出建议措施，有效的解决了民生需要，提高了治理能效。

（4）维护社会稳定

邓小平脍炙人口的名言“稳定压倒一切”，规定了他的社会治理目标，即维护社会稳定。他强调政治环境要稳定，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必须依靠稳定的政治环境。对内来说，改革和发展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局面；对外来说，中国如果呈现在世界的面前是乱哄哄的局面，世界各国都会敬而远之，所以国内局势稳定、安定团结，才能引进来外资和新技术。他还强调社会风气要稳定，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重大变化，邓小平特别强调，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与经济的同等重要，都要搞好。良好稳定的社会风气是社会治理顺利进行的先决条件。同时，他认为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和改革开放同等重要，要同时抓起，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是为改革开放扫清障碍的主要抓手，所以不得手软。根据邓小平的一系列稳定社会秩序的指示，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工作方针。还专门针对维护社会稳定提出具体工作方法，推进规范法制的维稳工作，

（5）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治理社会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促进社会公平的过程。一方面，邓小平把分配公平放在第一位。邓小平研究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他认为，过去人们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实际上是让人们共同落后，而且严重影响人们的积极性。要打破这种局面，坚持用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原则，既参考劳动者劳动产出的数量和质量，又将劳动者的态度、自身素质、专业水平、对行业的贡献融入分配方案中，让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样，人们在劳动中能够获得更多的公正和平等，提高他们的积极性，更愿意参与劳动，参与到社会建设中。同时，把分配制度化，严格考核，奖罚分明。另一方面，根据国情，邓小平在解决两极分化问题上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要经历长期的准备，要通过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总之，邓小平社会治理的核心目标就是坚持公平原则，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让人民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实现共同富裕。

3.2.2 邓小平社会治理思想的评价

从改革开放到十四大，邓小平带领数万万人民投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

设,结合中国国情,设计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万民致富之路。执政期间,他遵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现代化建设,提出一系列战略思想,把社会治理根植于改革开放大军中。他要求推进社会治理时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明确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治理的根本政治保证,并大力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助力社会治理有序进行。他不断推进社会生产发展,促进改革开放,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邓小平社会治理思想不仅延续了毛泽东社会治理的理念,它的伟大更在于始终通过发展经济解决社会治理的问题。

在社会建设中,邓小平着眼经济建设,把社会治理置于经济建设潮流,提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战略思想。用两手抓的战略,辩证的把社会治理同经济建设结合在一起,能够更好的处理社会问题,保证社会安定有序。邓小平的社会治理思想是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中不断形成的,既彰显中国特色,又汇聚马克思主义经典之魂。理论上,继承和发展前辈思想;实践上,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实践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3.3 江泽民对社会治理思想的丰富

江泽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按照邓小平理论的引领方向同新一届领导集体继续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但是,在经济体制的转轨期,人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各方利益关系的变动导致社会矛盾突显,保持稳定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与管理意义重大。江泽民针对新形势下的突出社会问题,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治理原则和方法,形成了丰富的江泽民社会治理思想。

3.3.1 江泽民社会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江泽民对社会治理工作认识更加深刻,认为推进社会治理需要协调社会各个方面。他针对社会治理活动的经验总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治理思想。具体内容如下:

(1) 坚持党的建设与管理

江泽民高度重视党的建设与管理,强调党的领导地位,是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一方面,党要不断加强建设,要代表人民利益,解决社会问题。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党的创新活力,帮助人民群众掌握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力,通过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达到人民自治的目标。同时,厘清“党一政一社”的关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杜绝党政权力过分集中对社会治理造成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要加强党的管理，建立完善的政治制度。党在不断探索执政能力、领导水平的过程中，加强各方面的制度建设，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

（2）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依法治国，江泽民在此基础上还要求以德治国，认为二者结合才能更有效的推进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是社会治理的法治基础，精神文明建设成为社会治理的德治基础。一方面，他洞察到，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社会不良现象随之产生，急需建立完善的经济体制机制，促进市场经济秩序发展。市场经济要通过守法、诚信来规范发展，所以还要将社会主义道德优势融入其中，来弥补经济体制机制中的不足。另一方面，他强调社会治理过程中道德的重要性。法治可以保障公民拥有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①所以提高公民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对社会治理来说相当重要。总之，坚持德治与法治统一，顺应了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这一重要的治国方略的提出，深化了我们对社会建设的认识，标志着党对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的飞跃。

（3）加强公共服务供给

江泽民高度重视社会对人民群众公共服务的供给，认为社会治理核心也在于此。他从社会现实问题出发规划社会治理工作，提出意见措施，努力提高社会公共服务能力。第一，提高教育供给。江泽民认为社会发展首要发展教育，他大力推进教育事业的体制改革，把教育和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努力提高人们的文化知识，加强公众的思想道德修养。要求全社会要关心教育工作，为下一代负责。第二，提高就业供给。认为“就业是民生之本”^②，解决就业、保证民生、维护稳定三者之间相辅相成，他统筹协调就业同经济、政治、社会的关系，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就业体制，以经济促进就业、以就业保证政治稳定。第三，加强医疗供给。强调医疗卫生对人民生活的极端重要性，他不断推进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加强农村医疗供给，通过中西医结合救治疑难杂症，全民都要为健康服务。第四，提高社会保障供给。江泽民就保险、救助、福利、优抚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为了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惠及更多人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确立了“一个保障、两个基本政策和三条保障线”的保障体系，有效的解决了社会保障问题，维护了社会稳定。

^①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

^②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4页。

（4）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

社会治理本质上就是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保证社会环境稳定，促进国家发展。江泽民针对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迅速回暖造成的各方面利益关系失衡、矛盾凸显等现象，认为新形势下，国家的重要任务是处理好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社会治理的题中之意。他认真分析原因，寻找解决途径。第一，保持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协调与促进关系，让改革促发展，稳定助改革；第二，建立人民内部矛盾化解机制，协调利益双方的平衡关系，发展生产力，解决贫困问题，推动社会稳步发展；第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干部走访基层，知民情、解民意，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作用，帮民办实实在在的事，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矛盾无处不在，用正确的方式就地解决矛盾，不激化矛盾。第四，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可以有效保障人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让人民群众在良好的环境中不受威胁。社会治安治理好，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相继化解，人们可以安居乐业，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

（5）加强基层民主建设

江泽民在十五大上提到扩大基层民主，这是对社会治理中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的肯定。基层既包括农村基层，也包括城镇基层，民主的最大实现场域就在基层。为了让人民群众更广泛的参与社会治理，不仅要提高他们的参与意识，扩大基层民主也是重中之重。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江泽民认为把村民集中起来，公开公正的讨论村事民事，让村民充分行使民主的权利，直接选举村中干部委员，他将这些行为制度化，形成了专门针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选举制、村民议事制和村务公开制，以此来强化基层民主的实现。江泽民把城镇基层民主建设重点放了社区建设中，通过加强社区党建，用党内民主带动社区基层民主的实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基层社区的服务能力。总之，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既能实现民主的最大化，又能促进社会的安全稳定。

3.3.2 江泽民社会治理思想的评价

十四大以后，江泽民基于对中国经济深刻变革的理解，带领我党着重进行市场化改革，使改革更具战略性和目标性。他深化了邓小平的法制思想，开启全面建设法治国家的局面，要求社会治理把“德治”融入到“法治”中，发挥道德优势，让社会治理领域的诸多事务更加有法可依。可以看出，江泽民全面继承以往民主法治思想，并注入到民主政治建设中，标志着我国社会治理的重大变革。

江泽民从多视角提出关于社会治理的新观点、新论断，并积极展开具体实践。他按

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调整政府、社会、企业、市场的关系，推进机构进一步改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总体发展趋势向好，但仍然处于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影响社会安全稳定，影响人民生命及财产安全，所以他要求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的落实，认为这是社会治理最重要的事情；为了实现对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保护，坚持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治理原则，进行社会治理；此外，江泽民在基层民主建设、流动人口的管理，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这一系列重要措施是江泽民为我国社会治理做出的积极贡献。可以看出，江泽民社会治理思想正在不断地丰富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

3.4 胡锦涛对社会治理思想的完善

胡锦涛带领新一届领导集体，在社会建设进程中，不断加强社会治理领域的改革创新，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社会治理格局，他们要求社会治理工作要体系化、科学化，要尊崇以人为本的原则创新社会治理。这一系列的治理思想，是胡锦涛对中国社会治理思想的进一步完善。

3.4.1 胡锦涛社会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关于社会治理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做研究。胡锦涛继承并发展了社会治理思想，在实践中他又增加新内容，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社会治理思想。具体内容如下：

（1）完善社会治理格局

社会治理主体不仅包括党政领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也列入其中。这是在利益需求、社会阶层、思想观念多元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下，为适应社会良性发展提出的社会治理格局，有效解决了政府单一管控模式。在党的领导下，胡锦涛对政府工作的要求是建立服务型政府，他不断强化政府治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政府主导工作要有效维护群众利益，并将建立服务型政府纳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战略目标；引导社会基层组织建立健全自治体系，推行网络化建设，提高基层群众和组织的自治与服务能力。胡锦涛在指导领导干部推进社会治理及其创新工作中，强调要充分发挥多元社会主体作用，调动社会团体、群众组织的积极性，形成“四位一体”治理格局。

（2）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原则

社会治理说到底是为了人民。胡锦涛扩大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利益

至上”思想理念，提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治理理念，这一理念规定了社会治理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在社会治理实践中，要以这一标准为原则，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有效解决群众切实关心的最实际的问题；要转变施政理念，加强建设服务型政府，建立体制机制，完善政府治理职能；要在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帮扶特殊人群；领导干部要摒弃社会治理中的官本位思想，最大程度上实现民本位。

(3) 加强群众信访工作，促进民生建设

随着人们利益意识、权利意识的逐渐增强，上访成为人们表达诉求、领导了解基层社会问题的最重要的平台。胡锦涛高度重视群众信访工作，对领导干部采用包案制，要求他们主动了解民情，参与解决处理问题，要责任到人，以此来加强信访工作。信访工作可以更多地反应社会矛盾，如上学、就业、住房、看病、收入分配等民生问题，是了解并妥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最接地气的方式。同时，以信访为载体，党群关系得到更好地构建，群众的合法权益、社会的安定与秩序都得到充分保证。为了更好地开展信访工作，站在人民角度解决社会问题，胡锦涛作了重要工作部署：建立完整的制度体系，推行领导干部接待制，而且要深入基层，及时了解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处理；运用信息技术，搭建公平公正的信访信息沟通平台；规范信访流程、完善调解机制。他始终希望通过加强信访工作，更好地解决社会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就是保障和改善民生，胡锦涛通过加大群众信访工作，有效助力社会治理，促进民生建设。

(4) 预防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对教育、就业、收入、社会保障、住房等生活需求不断增加，而我们在公共事务供给方面还存在短板，这些短板成为构成社会风险的重要因素，严重影响社会稳定。胡锦涛在民生及社会治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安排，一方面积极建立体制机制降低社会风险的存在，另一方面积极应对社会风险。他从加强公共安全体系的建设出发，在食品安全的标准及监管、企业安全生产的责任制、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等方面做了重要安排部署，有效的提高了食品安全、生产安全、人身安全以及提高了国家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这些工作都对防范社会风险、最大程度的保证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5) 重视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的治理

自改革开放以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直稳步推进，其中重要任务之一是促进城镇化进程和增加城市人口数量。如此一来，流动人口的数量将会持续增长。城镇化日益加

快、流动人口数量持续增长，这对人口管理工作提出更高要求。政府要充分发挥服务职能，创新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建立动静结合的人口流动信息库，健全管理机制，多角度帮扶特殊人群，为他们提供特殊管理与服务。我国市场经济处于转型期，大规模的城市人口流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努力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创新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机制，这是政府发挥社会治理职能的重要领域。胡锦涛从改革户籍制度、保障教育公平、维护农民工权益、健全保险转接制度等方面对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做了细致入微的规划。

3.4.2 胡锦涛社会治理思想的评价

十六大后，胡锦涛把建设和谐社会列为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重要战略，把科学发展运用到社会治理逻辑体系中，有效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不协调问题，通过科学发展，使人民生活更好，民主实现更广，最终做到社会和谐发展。他首次提出“四位一体”的社会治理格局，提出要高效、科学的解决社会问题，要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实践中，不断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党的十七大后，胡锦涛把政府职能转向现代服务型，要求提高政府的管理社会和服务人民的能力。他深刻分析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推进社会治理工作。

胡锦涛继承了经典作家以及中国历届共产党领导人的社会治理思想，同时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社会治理进行创造性探索。提高了党对社会治理的进一步认识，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治理思想，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的社会治理思想。

3.5 习近平对社会治理思想的升华

十八大后，习近平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围绕“两个百年”目标，不懈奋斗。在国家治国理政上提出了具有新时代的理念、思想、战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这背景下形成发展而来的。它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新理论成果，是40多年来改革开放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最新成就；其中包括的习近平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思想，对推进我国国家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3.5.1 习近平社会治理观的主要内容

中国步入新时代，最大的变化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实现人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成为党和政府主要工作重点。习近平从国家发展战略全局出发，立足人民，对进入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理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思想进行了发展和丰富。主要内容如下：

（1）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治理依旧强调党的领导，确立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对新时代的政治定位。所以社会治理的根本领导核心是党的全面领导。一方面，在治理主体趋于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治理一个复杂的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体系，必须有一个核心，能够从宏观上、顶层设计上把握全局事态，协调各方动态。中国共产党要发挥制度优势，对社会治理工作进行全面指导，从全局的高度思考和谋划社会治理问题，才能实现高效的社会治理。另一方面，加强党的建设。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创新与发展，要强化党的建设的全面性，做到“严”和“治”。从思想上树立对党的领导正确认识，提高政治意识，在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强化党的引领作用，一方面强化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堡垒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加强政治教育与能力培养，提高领导干部的治理素养。除以上之外，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党的自身执政能力。这就需要不断地加强自身理论学习，以及对经典原著的学习，不断地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的敏锐性，加强对科学技术的引领和改革创新，密切联系群众依法执政，和群众在一起。同时，实事求是，具有防范化解和驾驭风险本领等。在社会治理工作中，党要不断营造学习氛围，提供社会治理实践创新空间，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为民办实事，办好事，把各项治理工作都做到位，要迎难而上、各个击破。因此，要推进社会治理工作的根本保证是全面坚持党的领导。

（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社会治理工作的核心理念，也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标准。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切实解决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现实矛盾和问题，让人们在和谐社会建设的道路上，过上美好的生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带领党和人民，克服各种困难，持续对社会治理进行强化和创新，总结实践经验，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成果，社会治理工作进入到新阶段。一方面，社会治理过程中经验的积累与实践的创新，源自于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的经验所得，展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坚持全民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民主的最大化，把人民的智慧化作社会治理创新的源泉。另一方面，人民群众

是我们党工作的最终评判者，他们的满意度是社会治理工作的评价标准。社会治理工作的成效不是由工作本身评判的，而是由人民来评判。具体表现在人民的生活、权益、是不是所向往的，而这些是否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保障、或者过的好不好。所以社会治理工作要时刻聆听人民心声，急人民所想，以人民需求为出发点，不断完善各项体制机制，提高人民的满意度。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就是通过有效社会治理，让民生活的更好一点，能够充分吸收人民智慧，依靠人民实现社会治理创新。以人民为根本，把治理目标与人民结合，治理过程与人民互动，最终治理的成果与人民同享。

(3) 坚持以民生为本

习近平认为，民生与治理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民生的保证是人民幸福的基础，是社会和谐的根本，社会治理就是要保障人民能够幸福，社会和谐发展。就是要保证人们从小就可以得到优质得教育，长大了有更高的收入，年老了生病了有更好的医疗设施，退休了有优美的居住环境。因此，习近平针对以上各方面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做了重要安排部署，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享受国家发展的成果。同时，公共安全影响每一个人，关系到民心的稳定。具有范围广，内容多，不可预见性强等特征，是我国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社会治理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公共安全，建立公共安全屏障，人们可以安居乐业，社会能够安定有序，它关系到国家稳定发展大局。要通过严防死守最后一道防线，提升抵御风险的能力。如果说温饱是第一民生，那么，温饱后的平安将是民生的民生，极重要的民生。

(4) 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制度

习近平指导推进的社会治理工作，坚持社会治理要共建、共治、共享，并将其制度化。共建，即共同建设。一方面是社会各项事业的建设，涵盖社会各个领域。鼓励全体人民参与到社会各领域的建设中，改善生活，增加福祉。另一方面，共建也体现在制度建设上，建构社会治理共建体制，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完善治理制度体系，可以有效补齐我们在社会治理中的短板和弱项，对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人民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共治，即共同治理。多元的社会治理主体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特征，包含党委、政府机构、企业、社会团体、人民群众等，它们在治理结构的占位上，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形成党委带头，政府牵头，社会组织协同，全民参与的治理局面。共享，即共享成果。实现共享是实现社会公平的过程，通过社会治理使人们在民生上得到满足，在安全上得到保障，让每个人都享受到这些社会治理的成果。这就需要不断宣传共建共治基础上的共享理念，提高全员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

（5）坚持加强基层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不是宏观的理论提出，必须要有落脚点，就是基层。习近平重视基层建设，着重解决城乡社区治理问题。社会的基础是城乡社区，在这里可以直面群众，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与情感最直接表达场域，城乡社区的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点场域。解决好基层群众关心的社会问题，提升社区的管理能力和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让基层群众切实感受到治理成果，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努力方向。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不能一蹴而就，要多措并举：加强制度建设与法治基础，培养基层群众道德修养，强化基层组织德治内涵，加强居民的自治能力。此外，习近平高度认可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统一的治理模式，它一直都运用在乡村治理上，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城乡一体化、产业一体化的格局下，在市域范围大力推广“三治结合”治理模式这也是他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科学判断与创新发展的。

3.5.2 习近平社会治理观的评价

十八大后，习近平继承前辈们的社会治理思想，从国家发展战略全局出发，结合时代特征，提出了富有创见的社会治理理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推动了中国社会治理进一步的发展。

习近平对社会治理的论述和观点是伴随着国家发展布局，结合国家发展需要，尤其是在实现国家现代化建设，打赢脱贫攻坚，建设小康社会，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中逐步发展而形成的。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的国情作出了精准的判断，在社会矛盾发生转变的大背景下，从国家治理层面出发，给予习近平提出的社会治理理念以科学定位，明确了新时代社会治理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社会治理问题都寓于国家治理大逻辑中。

“人民”在习近平社会治理观中具有重要位置，人民是社会治理中主客体的统一，治理为了人民，治理的过程与实现要依靠人民，治理的对象是人民最迫切关心的利益问题，最终治理的成果，与人民共享。这是习近平人民观的重要体现，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的重要实践。他明确社会治理的总布局是“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以及赋予其深刻内涵，习近平不仅继承并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对我党社会治理领域也具有原创性贡献。社会治理的本质就是与人民一起建设，与人民一起治理，与人民一起享受治理的成果，这是当代社会治理体系的精髓所在，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明确了发展方向，进一步升华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内涵。

民生建设和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它们是相辅相成的。那么，推进社会

建设，就需要有配套的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治理的制度与之相适应。不过，在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公报中，习近平创造性地把社会建设一分为二，分别阐述，对社会建设的制度安排作了新规定，既要坚持完善民生保障制度，又要坚持完善社会治理制度，如此划分是对民生保障与社会治理的双向加强，也体现了对社会建设制度的重要创新。

“社会治理体系”的提出，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这也是一次伟大的创新。中国社会治理经历了从“管理”到“治理”的变迁，从“管”到“治”的升华，这是习近平在社会发展大格局中、在社会治理实践的探索中做的科学调整，同时，他把“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两个要素加入社会治理体系，使社会治理体系更完善、更科学、更有优势。习近平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社会治理实践，坚持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指导中国社会治理。

同时，习近平为了提高社会治理能效，他要求把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到基层建设，优化基层社会治理，而且延伸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统一的治理模式。“三治结合”即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一直都运用在乡村治理上，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城乡一体化、产业一体化的格局下，把“三治结合”延伸到市域治理，在城市社区治理中运用“三治结合”，是习近平做出的正确、科学判断，符合基层治理的客观规律。总之，习近平丰富的新思想、新理念，不断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他的社会治理观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延续，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升华，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强大的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经历了几代领导人的励精求治与改革创新，形成了丰富的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社会治理体系。这些治理理念顺应时代发展需要，对我国当代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灵活、开放的发展，社会利益需求更加多元，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矛盾等出现的新特点屡见不鲜，党和政府正在努力打造出新时代社会治理新的格局，破解社会发展之困局，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这是具有历史责任和世界眼光的伟大决策。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已经启航。今后，中国共产党依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伟大理论，指导中国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

4. 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发展的现实指导价值

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的、先进的、发展的思想，对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治理成绩突出，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比，社会发展相对不平衡不充分，各种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层出频发。社会矛盾日益更新，社会治理依然面临巨大考验。创新社会治理成为推进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要把理论创新与时代特征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植入今后我国社会治理实践，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下，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与发展，让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更完善，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更优化，新时代社会治理能力更上一层楼。

4.1 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运用价值

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一以贯之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指导，为我国社会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把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对中国社会治理提出新观点、新理念，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与时俱进。新时代，在推动社会治理思想发展时，我们必须把理论创新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要充分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

4.1.1 思想价值——理论创新与时代特征相结合

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理性分析资本主义民主制，与革命运动，尤其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巴黎公社革命的实践经验得结合，形成了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预期判断。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实践者——列宁，从本国的实践出发，结合当时俄国经济文化这个落后的国情实际出发，结合国家建设中的社会发展状况，创造性地探索出一系列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如何开展社会治理的思想。毛泽东立足新中国国情，在道路选择的判断中，旗帜鲜明的提出“寻找适合中国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实践的探索过程中，毛泽东结合新中国发展初期，从国家管理层面上，对刚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提出的一系列国家管理的思想理论，丰富和发展了经典作家们的社会治理思想。邓小平结合中国发展落后的现状，转移工作重心，重振中国经济，开创社会发展新局面；创造性地运用经典作家们的社会治理思想，形成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

理思想。江泽民基于对中国经济深刻变革的理解,把依法治国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方略,这是对我国社会治理的创新与发展。在深刻的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拉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胡锦涛结合中国当时社会实际创新了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效率,进一步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推向了新高度,通过重塑新型政社关系,改善了社会治理能力,从而促进了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们的社会治理思想都是在时代背景下不断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穿透性,要求我们把理论的创新发展与时代变更的特征结合起来。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而言,应当随着时代特征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进行不断创新发展。

进入新时代,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得更加灵活、开放,社会利益需求更加多元,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矛盾等出现的新特点屡见不鲜,这就使得要把当前的社会治理在当下社会发展中提出新要求。党和政府顺应时代发展需求,把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显著位置,努力打造出新时代社会治理新的格局破解社会发展之困局,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机制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这是具有历史责任和世界眼光的伟大决策。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已经启航,今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思路和目标任务,要紧紧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坚持新时代治理制度建设、完善新时代治理体系,创新新时代治理方式,打造新时代治理格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布好局。

4.1.2 实践价值——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需要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客观规律的分析,对未来社会进行了实践指导与预测,他们的社会治理思想以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为客观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揭露了其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并预测了未来社会的治理问题。列宁立足俄国经济落后的国情,结合俄国社会建设实践,创造性的提出“管理俄国”的新思想,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治理理论,即:列宁社会治理思想。所以,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必须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立足于当代,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需求,从社会具体实际中找问题,从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找办法,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新时代的中国,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矛盾发生重大变化。既反映了时代的特征,

又指明了发展方向。当前中国社会治理要立足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针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思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立足于当代，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需求，从社会具体实际找问题，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之快，展现了中国推进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进程之速。在这一过程中，快速发展的经济结构转型、变化深刻的社会结构，利益关系和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以及复杂多变的社会内外部环境，而且信息时代下的中国将面对结构复杂、形态多样的网络社会，让社会不确定性、不稳定性、风险性等因素难以预料。如何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是党和政府必须面对并要着手解决的重大课题。必须从社会问题的具体方面入手，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着力解决围绕在人民身边的、他们最关心的、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积极动员、积极组织、积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最终与人民一起分享社会治理的成果。只有立足社会发展中的实践需求，才能真正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和谐稳定、人民的安居乐业，这些伟大的愿景才能逐步实现。所以，肯定在社会治理实践中的成就，总结在社会治理实践中的不足，探索出创新社会治理发展的趋势，是党和人民的需要，也是衡量党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准。

4.2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取得的成绩及面临的问题

在历史交汇期，新征程已开启。我们要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充分肯定社会治理在社会建设中的突出成绩，总结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

4.2.1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取得的成绩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下大力气进行中国社会治理，他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从社会治理价值理念、治理能力、治理机制、治理结构、治理方法等方面全面进行改革创新。十九大后，中国进入新时代，各项社会事业稳步发展。但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道路上，仍然存在一系列现实困境。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有待进一步完善。

（1）各项社会事业稳步发展

近年来，我国在建设和谐社会、平安社会的进程中，成绩举世瞩目，人民生活水平

稳步提高。

一是摆脱贫困。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对中国人民的承诺，也是对世界人民的承诺。从党委到政府，从中央到基层，始终把脱贫工作作为第一民生，国家制定政策法规与脱贫方案。最终，农村脱贫人数达到近 1 亿，摘帽贫困县近 1 千个，贫困村 12.8 万个，这些举世瞩目的成绩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安定发展。

二是推进教育领域创新。我国高度重视人民对教育的需求，不断进行教育领域的创新与改革，教育公平迈上新台阶。农村教育体系的建设稳步发展，对教育资助、教育倾斜的工作都做了制度性的安排。尤其是高等教育实现逐步普及，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此外，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教育能力和自身学习能力，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立德树人、为人师表，促进教师管理体制改革，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上也有突破性的成绩。

三是促进就业与创业。就业是民生中是最受关注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从一般意义上讲，就业来源于创业，创业可以为就业提供可靠保证。我国坚持就业优先原则，通过创新创业来带动大众就业，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新的动能。高校是就业与创业的堡垒，扩大高校就业空间，帮助高校毕业生带着创业的目标去实现就业，实现大学生人生价值，目前是我们高校处理就业与创业的重要手段。同时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提高就业服务的能力，是实现和稳定高质量就业的保障。“十三五”期间，城镇就业人数达到 6000 万，就业压力持续增加，创业者随着就业人数的增加而增多。因此，促进就业与创业，能够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有效维护社会的稳定。

四是社会保障制度更加完善。近年来，国家格外重视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人民基本生活保障得到保证后，开始期待优质的生活，向往美好的社会生活，要求社会保障事业必须做实、做细，实现了纵横双向发展，横向涵盖范围要更加广泛，纵向制度要更加深入与完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基本上得到了保障，形成了协调、发展、持续的基本框架。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保障体系。我国始终坚持公平正义原则，强调社会保障事业的重要性，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让广大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安全感。

此外，我国在医疗卫生、收入分配、住房保障等方面也有突出进展。

（2）基层治理成绩显著

就社会治理场域及能效来说，社会治理重心和着力点应放在最基础的地方——基层，把基层的治理搞好了，社会治理的目的也就基本实现了。习近平曾指出：“社会治

理的中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①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各地不断推出政策措施提高基层治理水平，成功的基层治理案例屡见不鲜。例如：某地实施“制度化、引导式、跟踪式、服务式”分类管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多地区不断推进单向管理向协同治理的转变，促进自治、法治、德治的融合；广泛宣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理念，不断提高全民参与的群众自治积极性；构建社会要素-社会系统-政府协同互动的社会良性运作机制，真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总之，国家根据基层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性、目标多样性、内容广泛性以及多维度性，构筑了合作沟通、协商讨论、合作建设的治理路径，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政府、社会、居民的良性互动，为平安中国和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重要条件。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检验我国社会治理成功与否的一次大考验，展现出基层社会治理的巨大能效。在基层党组织的指导和协调下，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城乡社区组织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如居民委员会、业委会、楼委会、农村合作社、村民小组等，各类社会组织为上情下达，下情上传提供重要保障。实现全民参与疫情防控，全民参与社会治理。

（3）社会治理方式创新发展

通过方式创新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是实现社会治理水平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一方面，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已同信息化建设并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断运用网络技术、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国家通过统筹规划、战略布局，把网络渗透到各行各业。2020 网上群众工作峰会上，各地代表对“社会治理网络参与”各抒己见，进行了深刻交流。网络参与作为最大亮点运用在各地社会治理中，卓有成效。例如北京的“接诉即办”工作机制；浙江省实施线上化解多元矛盾纠纷案件；江苏省简化审批流程，提供线上不见面审批服务。各市都在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新路子，运用网络科技，将社会治理推向科学、精细、智能、现代化的道路上。另一方面，全面推行依法治国。十八大后，党和国家继续坚持社会治理法制建设，形成法律制度。在社会法制建设中，全面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着力推进行政执法进程，努力解决执法突出问题；建立多元主体共治的社会治理体制；进一步推进协商民主法治化。领导干部继续提高法治思维，弘扬法治精神，培养法治信仰，社会各项事业都在法治化的道路上有条不紊的发展。

（4）构建国家安全体制

^①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27 页。

社会治理与国家安全具有内在联系，它属于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中社会安全的范畴，良好的社会秩序，稳定的社会环境都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条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是构建国家安全体制的重要手段。十八大后，我国统筹规划国家安全建设，形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拓宽了社会治理的创新视野，把各种新型的社会风险纳入到社会治理中，社会治理领域不断扩大。国家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构建国家安全体制，统筹规划决策国家安全战略，安排国家安全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关于加强国家安全工作的意见》也相继颁布，明确了国家安全的定位和任务。随后又颁布了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形成较完善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为解决国家安全问题提供重要法律保障。

4.2.2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

新时代，社会安全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但在社会大局总体稳定的前提下，社会利益关系依然复杂多变，社会内部矛盾问题相互交织叠加，社会治理工作受到阻碍，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受到制约。

(1) 社会治理主体自身建设问题

社会治理主体的发展对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有双重作用，当社会治理主体良性发展，起促进作用，反之将起到阻碍作用。当前的社会治理还存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的单一治理现象，社会组织协同能力有待提高，公众参与意识有待加强。这对社会治理效率有极大影响。

第一，政府占位不明确。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受到传统社会管理理念的影响，政府在社会治理实践中更多地表现为全方位治理，过多的承担市场和社会承担的社会事务，出现越位，增加自己的压力，大大降低社会治理效率；有时还错位，出现政社职责界定模糊，相互推诿责任的现象，导致社会治理效果大打折扣。

第二，社会组织协同能力欠佳。社会治理中，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是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关系。随着社会发展需要，我国的社会组织不断扩大，但从数量来看，有待继续扩大；究其内部结构，它规模小、缺乏专业队伍指导、运作时规范性不强，缺乏独立自主性；社会组织配合力度欠缺，尤其是提供公共服务时，信息资源互通联通平台的构建不足，缺乏统一调度力量，造成社会资源、人力资源的浪费。例如在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役中暴露出的：社会公益组织与当地一线社会组织的协同问题，募捐到的钱、物品等无法顺利被运用到一线防控上；疫情供需信息时刻变化，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同问题

重重；缺少一级协同组织与当地政府进行良好沟通对接等等。

第三，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实践的意识 and 积极性不强烈。社会治理需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参与。但是，公民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制约，常常出现“官本位思想”“权威崇拜”等心态，导致他们缺乏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影响他们投身社会治理实践的积极性；公民自身能力欠缺，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认识程度不同，很大一部分人们没有经过专门的培训，参与技能和参与习惯都无法得到提高，久而久之公民会产生从众心理，影响他们的积极性；行政机关在吸纳公众参与社会事务态度的认识上明显不足，给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较少，各类形式的座谈、协商常常是走过场，公民大多应付了事，实际效果不明显。

（2）社会治理制度不健全不完善

我国社会治理基础制度涉及社会各个领域，基础制度本来应该是针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而建立的，但是，由于目前社会利益冲突多元化，社会结构层次化。社会关系复杂化，导致社会基础制度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社会出现的失调关系，失范行为，失衡结构等问题，社会治理制度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困局问题。

第一，社会治理制度不够健全。社会治理制度的完善就是为了补齐一直以来社会在建设和发展中的治理短板。十八大后，中央和各级政府不断推进制度建设，但是由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短板太多，一些基础制度还存在缺失，信用体系与信息平台建设相对缓慢，与当前社会发展不匹配，不能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二，社会治理制度设计不够合理。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社会事务呈现多元化、复杂化，为了应对当前出现的困局，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并从制度上作了制定。但是，有些规章制度明显具有临时性和地域性，制度的设计存在不足；在规格的制定上也不够齐全，主要表现制定标准过时，配套操作机制不细致；还有一些制度在设计时过于理想化，与实际结合不紧密，无法顺利贯彻执行，治理效果不明显。社会治理本应以点到面，点线面结合形成网络化治理，但是，治理制度的协调失范。这些设计的不合理，都会导致了治理成本的增加了，人民满意度的降低。

第三，政策执行难。国家不断强化顶层设计，出台多项社会治理政策措施。政策的出台与落实，后者更重要，而后者问题较为突出。有的政策在出台后，在基层政府执行时大打折扣，根本不能体现出政策为民、惠民；同时，政策执行起来难度大，造成这一原因因素很多。其中，一方面，政策的出台周期过长，待政策落地，再到执行所需时间很长，这样容易造成政策过时，跟不上社会发展需求。另一方面，多个政策重叠。政策

重叠容易形成资源浪费,也会形成多个政策同时执行,使社会资源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给执行者带来不方便和难度,尤其是对政策的理解把握上。

(3) 社会治理方式方法有待改进

目前,中国社会治理方式由于治理理念的落后,依然保持过去的“人治”传统。自上而下的管控模式、刚性治理手段等,并不能有效进行社会治理。主要表现在:

第一,社会治理的滞后性。中国社会治理应当是积极地社会治理,就是要从源头发现问题、防范风险,要有问题意识,通过有效社会治理,使人民群众感受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同时,获得幸福舒适的生活、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可是,目前我国社会治理呈现本末倒置现象,重反应轻预防,各类重大事件的应急防范措施不到位,每每遇到问题才去被动进行治理弥补,所以说事前监管和预防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的环节。

第二,社会治理工作方法有待提高。做好社会治理需要从长期来看,把它作为一项工作来抓。要做好这方面工作,一方面,须从国家的法律法规层面,用政府部门的规章制度以及党的政治纪律等强迫的手段。另一方面,要依靠社会基础组织,组织、引导、协调、激励等柔性的手段。现代化的社会治理理念需要有当代的社会治理思维,需要把刚性的治理手段转化成柔性的治理引导,从强制强迫行为变为服从、引导,把硬性的政策制度转变为服务化的解答,营造出良好的社会舆论,为社会治理铺平道路,把民情、民心、民绪由堵截变为疏散,适时化解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防范存在的各种风险。然而,一直以来,我国各地政府多多少少存在着在一些不好的作风,往往习惯于用强制手段、惩罚性措施实施社会治理的政策和制度,不太重视用引导、疏散等柔性方法。

第三,现代科技作用未充分发挥。现代科技发展迅速,网络技术的研发与发展,为社会治理提供各种工具和手段。但是,政府在运用现代科技解决社会治理问题时,对现代科技的运用掌握不够熟练,有的是硬件设施薄弱,无法满足实施技术手段的硬件需要,有的是人员自身学习能力的欠缺,无法熟练运用现代技术。其实,现代科技作用未充分发挥,主客观因素并存。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有巨大的潜力,把信息技术同社会治理相结合,便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它们在满足需求、综合治理等方面的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

4.3 今后我国社会治理发展的新趋势

十九大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了重要安排部署,要求各项社会事业要秉持坚持与创新、兼容并蓄的理念。那么,立足国情及时代特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

思想指导社会治理实践，从制度、原则、方法等方面对社会治理进行创新发展，坚持把社会治理任务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完成更具时代性的治理任务。

4.3.1 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

（1）加强党的统领作用

党的领导在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面对的新形势新任务，需要多元主体参与，在众多主体中，党的领导是核心。党要谋大局、定政策，要统览全局，协调各方，处理各种关系，有了主心骨，社会治理才能规范有序。所以要不断加强党的统领作用，特别是基层党建，把党同政府、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建设好，形成“一主多元”的治理格局。

（2）加强联动融合，开放共治

社会问题纷繁复杂，很多关系群众利益的问题需要多部门解决，党委政府之间、部门之间、政府企业之间相互配合，联合协调联动，这就要求明晰责权，共建共治，完善责任链条。信访工作的艰难主要在于处理很多疑难杂症，当观念冲突、利益冲突、心理问题等交织在一起，党委政府不能有效解决问题时，要广泛动员民间力量参与，综合施策。加强机构内部的职责划分、明确部门间的责任权限，加强党政机构改革、深化简政放权，促进政府职能转变。这些都对促进社会治理联动融合、开放共治有重要意义。

4.3.2 进一步优化社会治理理念原则

（1）继续深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站在人民立场想问题、做决策；就是要坚定人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治理的目的是为了人民，治理的过程与实现依靠人民，治理的对象是人民最迫切关心的利益问题，最终治理的成果，与人民共享。新时代里，人民最急切最关心的利益问题，就是能增加人民幸福指数、紧紧围绕在人民身边的问题，不仅要从多数人角度去分析处理问题，更要考虑弱势群体、困难群体，拿捏好分寸、把握好尺度，维护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

（2）坚持公平正义原则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稳步上升，人民群众对公平和民主的认识越发深刻，社会治理中秉持公平公正的必要性越发突出。所以，要

切实考虑人民能够平等参与到社会治理工作中，保证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权利公平；构建共建共享的发展新机制，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通过司法和执法体制的深入改革，让人民群众真正得到公平与正义。

4.3.3 运用更加科学的方式方法进行社会治理

(1) 加强法治保障

法治是社会治理最有效的开启模式。法治保障内涵丰富，既包括国家层面的科学立法，也包括社会层面的依法治理，还包括个人层面的尊法守法。十九大后，国家在法律法规的完善中，形成了上下贯通的社会治理领域的法律体系，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成为我国推进社会治理工作重要的制度资源。完善制度体系的同时，领导干部面对社会问题，思考方式与解决方式都要依靠法治思维，依靠法治来化解人民矛盾。我国还在普法方面加强力度，不断提高公民的法治意识，真正实现法治社会。

(2) 有效利用现代科技技术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社会治理复杂程度不断加大，优化理念、完善制度、创新机制对于提高社会治理能效固然重要，但还不够，还要利用现代化的、信息化的科技平台，提高社会治理技术手段。近年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生活便利，人们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都在深刻改变，同时也在改变着社会治理的方式，为解决问题与矛盾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手段。

(3) 坚持社会治理精细化、专业化

城镇化的不断推进给社会治理提出新的课题，对一些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社会治理工作的推进要更加精细、科学。提高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必须要提前认识到社会矛盾的个性特征，把握人们的现实需要，做到精准施策。不仅要充分运用现代化技术，还要培养专业的治理人才。专业化也是社会治理不可缺少的部分，让专业的人用专业的方法服务群众、解决问题，再加上精准施策，可以形成更加有效地社会治理。随着社会治理愈发精细与专业，网格化管理将成为今后社会治理的创新趋势，这种现代化的技术将越来越成熟的运用到社会治理中。

4.3.4 社会治理的任务要更具时代性

(1) 全面提高基层治理水平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为我国第 14 个五年计划做了重要的工作安排部署,要求在“十四五”期间让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所以,要加强基层建设,搞好基层建设。社会治理的重要场域在基层,把基层治理落实到城乡社区,社区治理落实到群众,充分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性。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离不开居民自治,提升居民自治能力能有效推进基层治理工作。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在其正确方向的指导下,进一步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加强基层党建,把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同权、责同时落到基层上,加强基层组织的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标准,活跃治理氛围。满足群众需求,提升群众满意度,让他们有更加强烈的获得感。在基层治理中,社会组织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它们是基层治理的主体力量,能够最大限度的提供公共服务。社会组织内部要建立党组织,发挥统领作用,做到哪里有社会组织哪里就有党组织。在政府给予最大支持的前提下,对社会组织进行科学管理:明晰职能,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意识;科学分类,根据社会组织的功能特性,有目的、有重点的分类推进社会组织活动;强化监管,在发展过程中,监管环节不可缺少,完善对社会组织的综合监督制度,让政府、社会、同行以及人民多方共同监督,建立自律与他律结合的约束机制,使社会组织向正确方向发展。

(2)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国家提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这一概念,把社会治理现代化落实到市域,这是对社会治理实践的精准定位,是社会治理向基层下沉的重要举措。根据我国行政级别的划分,地级市是接上连下的关键环节,做好市域社会治理工作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社会、人民安全事业的重要基础。一方面,党的统筹领导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政治保证。党委领导为主线,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社会力量,解决风险性更强、流动性更特殊的新型社会矛盾,形成良性互动的市域社会治理组织体系,充分体现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域”的承上启下作用。市域是建立在国家和省级、区县级之间的中间力量,处于特殊位置,既执行上级政策,又拟定下级对策。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强调市域的主导性作用,突出地方政策的研究与制定、创新地方治理方式与手段、地方资源的统筹与调配。最后,通过技术手段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是市域治理的发展方向。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采集、整理、分析数据,整合出更多与市域治理有关的准确信息,提升治理能效;把信息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与社会组织相结合,通过相互交织的治理网络,提高市域社会治理的能效,提升在复杂社会条件下进行社会治理的实战能力。

(3) 推进风险治理与应急处置的精准狠

社会治理一般包括常态化的治理和非常态化的治理，也包括风险治理和突发事件的治理。随着社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高风险性成为一个时代特征，提高预防风险、应急处置、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是健全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方面。中国的应急管理体系建立较晚，以“非典”疫情的突发公共卫生安全应急处置为拐点，我国对应急管理建设全面展开，建立了应急管理领导机构，健全了应急处置机制，完善了重建机制，加强了应急预案的编写、管理与演练工作。风险应急管理变得更加科学，更加规范，更加制度化与法制化，为社会现代化建设提供公共安全保障。“新冠肺炎”疫情检验了我国应急管理的能力，战役成功，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部门协调能力弱、联动合作机制不健全、应急管理人员实战能力弱等等。新时代的风险治理和应急处置应当更具时代性，补足过去的应急管理短板，由党组织统筹规划，政府主导工作，社会参与治理，加强应急救援能力，坚持安全第一原则，同时两手抓，既加强应急“软实力”——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又提高应急“硬实力”——设备与物资的储备，双管齐下，打赢灾害防治战和安全保卫战。

结 语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构成，社会治理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它是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要条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是我党在很长时间积累的经验总结。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作为其重要构成，正在指导中国社会治理有序进行。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以下几点认识：

(1) 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内容广、涵义深，有马克思恩格斯的未来社会构想，有列宁治理俄国的经验总结，有中国领导人们的继承与发展。他们都是一脉贯通的。

(2) 不论是文本中的治理构想，还是实践中的治理经验，经典作家们丰富的社会治理思想都是中国社会治理的行动指南，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创新与发展，他们的社会治理思想理论为我国社会治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3) 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求，结合时代特征，创新社会治理理论是时代的需要。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成绩斐然，但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中，社会治理也面临许多困境与挑战，用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指导今后中国社会治理显的尤为重要。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讲话、报告、谈话，查阅了相关的文献，同时结合当时历史时期社会治理的举措，对各时期社会治理做了研究，但还是比较浅显，尤其对原著的理解和把握，还存在很多不足的方面。此外，对当代社会治理体系的研究也不够深入。现实是变化发展的，实践是无止境的。随着中国对社会治理的不断探索，必定会形成更加完善的社会治理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将更加深入。因此，我会更加努力，持续深化这一研究。

参考文献

一、专著类: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列宁选集》[M]（第1-4卷）（第三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 《列宁全集》[M]（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6] 《列宁全集》[M]（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7] 《列宁全集》[M]（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8]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 《毛泽东文集》[M]（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0] 《毛泽东文集》[M]（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1] 《毛泽东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2] 《邓小平文选》[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3] 《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4] 《江泽民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5] 《江泽民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6]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18] 《胡锦涛文选》[M]（第2卷）（第三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9] 《胡锦涛文选》[M]（第3卷）（第三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20] 胡锦涛.《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21]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22]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 [23]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 [24]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25]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2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2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第3卷）.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29]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30]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 [31] 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 2017年.
- [32] 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33] 《十九大精神十三讲[图解版]》[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34]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 [35]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9.
- [36]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37] 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9.
- [38] 《图解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39] [意]葛兰西著，曹雷雨，姜丽，张跃译.《狱中札记》[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40] [美]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 [41] [德]亨利希·库诺著，袁志英译，《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M].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 [42] 郑航生，等.《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M]. 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1.
- [43]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44] 何增科.《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M].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 [45] 詹真荣、熊乐兰.《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M].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1.
- [46] 徐崇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13.
- [47] 龚维斌.《中国社会治理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 [48] 陈光金.《社会治理现代化：社会体制改革与法治社会——全国社科院系统社会学所所长会议论文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 [49]童星.《中国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研究书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 [50]梁树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社会主义建设思想》[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 [51]唐韵.《社会治理与社会保护》[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 [52]许斗斗.《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
- [53]田应奎.《中国治理》[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
- [54]朱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M].重庆出版社,2019.
- [55]谢志强.《社会治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56]魏礼群.《中国社会治理通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 [57]龚维斌等.《中国社会治理创新之路》[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9.
- [58]高健.《马克思社会治理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建设》[M].辽宁人民出版社,2018.

二、论文期刊类

- [1]刘浩源.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及其启示意义[J].科技经济导刊,2016(29):237.
- [2]马晓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管理思想及其当代发展[J].改革与开放,2015(14):45-47.
- [3]张福东,何冰.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的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5,18(13):230-232.
- [4]王素玲.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及其启示意义[J].人民论坛,2015(14):226-228.
- [5]周志忍.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的开拓与创新之作——评黄建军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管理思想及其当代发展》[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7(02):127.
- [6]连朝毅.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02):89-96.
- [7]郭风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管理思想及现实意义[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4,16(01):65-70.
- [8]刘爱莲,杨春,刘心一.“中国梦”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管理[J].江南论坛,2014(03):27-29.
- [9]仲兵,刘爱莲,刘心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管理思想及其现实价值[J].学术论

坛, 2013, 36(11):17-21.

[10] 仰义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管理思想及其启示[J]. 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 2013(05):40-44.

[11] 孙继红. 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的当代价值[J]. 企业导报, 2013(15):70.

[12] 黄建军.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管理思想探索[J]. 陕西行政学院学报, 2013, 27(01):5-9.

[13] 刘军.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视域中的社会管理模式创新[J]. 高校理论战线, 2013(02):22-25.

[14] 肖应明.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管理理论的时代化问题研究[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30(06):114-116.

[15] 张龙. 论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视角下的社会管理思想[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35(05):593-596.

[16] 陈岩. 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研究思考[J]. 企业家天地(理论版), 2011(07):126-127.

[17] 石英.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视野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三个维度[J]. 人文杂志, 2011(04):1-4.

[18] 贾思芳. 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研究述评[J]. 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 2009, 19(06):1-3.

[19] 陈志光. 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J]. 社科纵横, 2019, 34(03):81-86.

[20] 曲姿璇. 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在中国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路径[J]. 理论观察, 2019(02):35-37.

[21] 梁桂兰. 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的当代价值[J]. 智库时代, 2018(43):29+31.

[22] 朱玉伟. 走好马克思主义引领下的社会治理之路[J]. 人民论坛, 2018(24):110-111.

[23] 杨雨林.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从国家治理走向社会治理[J].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17, 40(04):90-93.

[24] 罗志刚. 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研究综述[J]. 社会科学动态, 2017(06):58-63.

[25] 龙玲玲. 习近平对社会治理规律的时代探索——从马克思主义矛盾观谈起[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7, 35(01):40-42.

[26] 吴春艳. 新常态下社会治理机制的创新——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J]. 唐山学院学

报, 2016, 29(05):95-99.

[27] 陈臣.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与社会治理现代化[J]. 宁夏党校学报, 2016, 18(04):14-16.

[28] 孙新建.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制度与人道主义思想[J]. 岭南学刊, 2016(04):40-44.

[29] 孙涛.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治理思想及其现实借鉴[J]. 理论学习, 2016(01):47-50.

[30] 曾正滋. 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野中的社会组织与人的全面发展——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为论域[J]. 理论月刊, 2015(03):16-21.

[31] 郭荣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社会治理理念的探索[J].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 2014, 16(06):62-67.

[32] 孙咏红.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4, 13(12):13-14.

[33] 杨晶.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治理的思想及其启示意义——与诺曼·莱文商榷[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28(11):84-90.

[34] 孔卫英, 陈跃. 邓小平社会治理思想探析[J]. 邓小平研究, 2015(02):96-103.

[35] 朱玉伟. 走好马克思主义引领下的社会治理之路[J]. 人民论坛, 2018(24):110-111.

[36] 袁媛淑.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权思想及其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价值[J].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6(02):11-12+19.

[37] 刘爱莲, 李树文. 论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中的辩证思维[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17(05):6-10+103.

[38] 丁元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8(03):13-18+152.

[39] 李学举. 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 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J]. 求是, 2005(07):16-19.

[40] 丁元竹.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思路[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2):108-117.

[41] 燕继荣. 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理论解释[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54(05):69-77+2.

[42] 曹秀燕. 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的综述[J].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新探索, 2014(00):70-79.

- [43] 杨雨林.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从国家治理走向社会治理[J].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17, 40(04):90-93.
- [44] 马力昉. 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对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的启示[J]. 前沿, 2014(23):55-56.
- [45] 蔡青竹. 走出结构之谜: 社会治理图景的三个维度[J]. 大连干部学刊, 2016, 32(01):14-17.
- [46] 龚建华. 马克思“市民社会”视域下党的社会治理理论研究[J]. 社会治理, 2016(04):57-62.
- [47] 李戈. 毛泽东社会治理探索的三重辩证法[J]. 求索, 2019(02):48-56.
- [48] 代山庆. 论江泽民社会管理思想[J]. 学术探索, 2012(04):109-114.
- [49] 代山庆. 论胡锦涛社会管理思想[J]. 学术探索, 2013(12):36-40.
- [50] 蔡清伟. 胡锦涛对社会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新贡献[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43(06):15-20.
- [51] 诺曼·莱文, 王今一. 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09(04):149-154.
- [52] 刘爱莲, 李树文. 论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中的辩证思维[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17(05):6-10+103.
- [53] 陈辉. 毛泽东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管理[J]. 东岳论丛, 2005(06):28-31.
- [54] 郭风英. “国家-社会”视野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研究[J]. 社会主义研究, 2013(06):70-75.
- [55] 王驰. 邓小平社会治理思想探析[J]. 新乡学院学报, 2015, 32(04):6-9.
- [56] 孔卫英, 陈跃. 邓小平社会治理思想探析[J]. 邓小平研究, 2015(02):96-103.
- [57] 周文翠, 刘经纬. 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与当代社会治理创新[J]. 甘肃理论学刊, 2015(04):109-112.
- [58] 何云峰. 建国初期毛泽东的社会治理思想[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21(05):1-9.
- [59] 颜克高, 任彬彬.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价值、结构与推进路径[J]. 湖北社会科学, 2018(05):46-52.
- [60] 朱新武, 王明标.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理论阐释与体系构建[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46(06):19-25.

- [61]曲姿璇. 论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研究[J].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9, 33(01):24-27.
- [62]刘旻, 李强, 莫秋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思想的科学内涵与现实意义[J]. 社会科学家, 2019(11):28-33.
- [63]周舟.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研究——基于理论创新和研究体系的分析[J]. 延安党校学报, 2019, 35(04):60-65.
- [64]梁德友, 徐诺诺.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几个理论问题[J].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1(04):8-19.
- [65]王刚.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J]. 探索, 2020(01):16-24.
- [66]刘志昌. 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为例[J].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20, 13(02):118-126.
- [67]曹胜亮, 胡江华. 论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中国化表达及其证成逻辑[J]. 贵州社会科学, 2020(08):4-10.
- [68]师林. 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的三重意蕴[J]. 延安党校学报, 2020, 36(05):49-53.
- [69]陶林. 论国外社会治理的模式及借鉴. [J].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7, 38(08):31-36.
- [70]潘丽. 国外政府治理经验及其对我国社会治理启示. [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1(01):67-72.
- [71]曲甜, 张小劲. 大数据社会治理创新的国外经验: 前沿趋势、模式优化与困境挑战. [J]. 电子政务, 2020(01):92-102.
- [72]房宁. 国外社会治理经验值得借鉴[J]. 理论导报, 2015(02):57-58.

三、硕博论文类

- [1]李百花. 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马克思主义分析[D]. 中共中央党校, 2012.
- [2]张丽莉.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社会管理思想研究[D]. 南开大学, 2013.
- [3]黄建军.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管理思想及其当代发展[D].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 [4]李鹏. 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在当代我国社会治理创新中的运用和价值研究[D]. 河南大学, 2014.
- [5]高宏. 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我国社会治理的路径研究[D]. 延安大学, 2016.
- [6]田树洋. 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国家原理的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研究[D]. 山东财经大学, 2016.

- [7] 白佳丽. 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D].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 [8] 钟丽娜. 马克思主义人本观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创新[D].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 [9] 王鑫.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治理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研究[D].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2017.
- [10] 孙文凯.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视域下社会治理创新研究[D]. 山东理工大学, 2017.
- [11] 田瑞华. 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研究[D]. 内蒙古大学, 2017.
- [12] 秦烁楠.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探析[D].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2019.
- [13] 潘从君. 习近平社会治理观研究[D]. 山东农业大学, 2020.
- [14] 张子君. 习近平新时代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研究[D]. 兰州理工大学, 2020.
- [15] 王飞龙. 列宁社会管理思想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 [16] 王叶. 邓小平社会治理思想研究[D]. 鲁东大学, 2018.
- [17] 张佳楠. 邓小平社会管理思想研究[D]. 北京交通大学, 2018.
- [18] 汤吉亮.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研究[D]. 东北石油大学, 2016.
- [19] 李雅. 胡锦涛社会管理思想研究[D]. 湖南科技大学, 2012.
- [20] 李明悦.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念研究[D]. 东北农业大学, 2019.
- [21] 代山庆.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管理理论、实践与制度创新研究[D]. 西南交通大学, 2016.

四、报刊与网站类

- [1] 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网址 www.gov.cn/govweb/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453176.htm.
- [2] 汉辞网:《汉语大词典》http://www.hydc.com/cd/htm_a/28579.htm.
- [3] 人民网:《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5/65448/4526430.html>.
- [4] 人民网:《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http://cpc.people.com.cn/n1/2019/1106/c64094-31439558.html>.
- [5] 新华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10/29/c_1126674147.htm.

- [6]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9年1月1日。
- [7]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京隆重举行》[N], 《人民日报》, 2021年2月26日, 第一版。

后 记

时光飞逝，在校学习的生活就要结束了。

研究生生活是每位大学本科生向往的生活，工作 8 年后的我依然能够步入这里，我为之兴奋、为之自豪。三年的学习时光短之又短，但忙碌与快乐并存。同学情、师生情融汇成一条友情长河，伴我今后人生。三年求学治学经历，有收获、有感激。收获了海量知识，收获了能力与信心。这是母校、研究生处、马克思主义学院给与我的温暖与智慧，所以我很感激！

我的导师张存刚教授，治学严谨、思想睿智、知识渊博、宽容厚道。专业学习上，老师给予了我很多方向性的指导；论文的写作中，他用耐心和智慧开启我的创作灵感，尤其是在选题和切入角度的确定上，导师给了我很多专业的意见建议，我的论文才得以顺利完成。在这，我要道一声感谢！

我还要感谢我的各位代课老师以及班主任：赵俊老师、刘文玉老师、李国红老师、李兴平老师、张小虎老师和李娟老师。他们坚持立德树人，坚持为人师表，他们对学术刻苦钻研的态度是我学习的榜样。

还要感谢在我学习生活中，帮助过我的同学朋友们，谢谢你们对我每一个决定的支持与理解。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没有家人的支持，我无法坚持到现在！祝愿所有的老师工作顺利、祝愿所有的同学学业有成，我将带着大家的关心继续投入今后的学习和生活，谢谢大家！